

日治時期顏家的產業與婚姻網絡^{*}

陳慈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 作者由衷地感謝卓遵宏教授和匿名審查人的審查意見，以及黃富三、林蘭芳、王耀德、蔡明憲、鐘苡青、賴錦生、吳錦青等諸位教授和與會專家學者的賜教。

摘要

顏家於20世紀初期經營瑞芳九份地區的金礦業而致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則擴展到北部煤礦業，與日本財閥藤田組、三井家分別共同投資「臺北炭礦株式會社」（後來藤田組退出，改組為臺陽礦業株式會社）和「基隆炭礦株式會社」，成為掌握金、煤礦業之一大家族。他們開發新礦區，引進新技術、購置新機械，在配合殖民地政府獎勵兩礦業的政策之下，締造了事業的巔峯。顏家人士因稱霸礦業界且熱心公益，在地方上深具影響力，故成為「當局」與民間之間的橋樑。他們重視臺灣現代化的基層結構——教育、交通和電力——之建設，力爭臺灣人與日本人平等的待遇，企求打破民族歧視的藩籬，期盼日本當局能放棄「殖民」的心態。雖然在非常的政治環境之下，效果不大，但足以表現出其胸懷。

另一方面，顏家依然是家規嚴謹的家父長制，三兄弟中，由於老大東年身體虛弱，故老二雲年彷彿「掌門人」，安排子姪的教育與婚姻。當雲年過世後，國年繼之。在他的費心考量下，第二代的婚姻圈逐漸擴大，而基本的要件是門當戶對，聯姻範圍兼及企業界和詩文界，地理上則遠及南臺灣。並且他也獨具慧眼，物色適宜的經營人才來幫助家業。換言之，聯姻與企業的經營有不容忽視的相關性。我們如果再進一步追究顏家姻親方面的婚姻圈，則可以斷言這種從血緣所擴散出的「姻緣」網絡，超越了傳統中國的地緣和業緣網絡。

關鍵字：顏家，日治時期，礦業，財閥，臺陽礦業株式會社，基隆炭礦株式會社，姻緣網絡。

壹、前言

放眼古今中外，隨著時代的變遷，會出現不同模式的家族型態，家族為了求生存與發展，不得不多少適應當時所處的大環境，日本殖民時代的臺灣基隆顏家即因為順應時代潮流而能以礦業為基軸，在臺灣政經界發揮力量。顏家的事業由顏雲年所開創，其弟國年擴展之。他們兩兄弟都擁有深厚的漢文根基，除了縱橫工商業界外，在當時的詩壇亦負盛名。

顏家遠祖可上溯到周朝的顏友，而到清代乾隆年間（18世紀後半），顏浩安從福建清溪金田鄉，率子侄渡海來臺，在臺中大肚溪附近辛苦從事農業。10多年後遭遇大飢荒，資本盡失，於是舉家回福建，卒於安溪。到嘉慶年間（19世紀初期），其子玉蘭和玉賜再度來臺，先在梧棲港附近的海濱住下，過著半農半漁的生活。後遷居基隆附近的暖暖，此時玉蘭的第三子斗猛年方五歲。他長大後，與其兄和堂兄們（即玉賜之子），共同從事開墾，生活漸寬裕，但昆仲仍不分炊，家屬眾多而和諧。道光27年（1847年）又開墾鱗魚坑一帶，這就是日後顏家的發跡地。斗猛當時已以傳統的「狸掘法」（背著畚箕深入煤坑採掘）從事小規模的煤礦開採業，逐漸累積資金，他的第二個兒子尋芳承繼之，率領族人在四腳亭一帶挖採「黑金」，他就是顏雲年和國年兩兄弟的父親。¹

本論文擬探討日治時期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顏家的事業發展過程所代表的意義。首先概述顏家在臺灣的事業；其次說明顏家對地方的貢獻；再分析他們對文化教育的見解以及婚姻圈，以突顯出臺灣本土資本家在非常的政治環境下，如何藉由東北亞區域間的產業與「姻緣」網絡，開拓一片自己天地的魄力和代價。

1 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基隆：尚友會，1939年），頁2-4。

貳、日治時期的顏家事業

在日治時期的「五大家族」（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家和高雄陳家）中，相異於其他四大家族皆以大地主身分發跡，顏家的出現於臺灣歷史舞臺上，是與臺灣礦業的發展息息相關，主要是金礦與煤礦業。

一、金礦業

首先，在金礦方面，顏雲年是以承包人的身分開創其事業的。日本占領臺灣初期，由於抗日人士仍混雜九份礦區，總督府剿撫無效，乃強制封閉九份礦山，嚴禁採掘。迨1896年9月頒佈實施「臺灣礦業規則」，准許一般礦業之開採。但對於金礦，則唯恐多數人爭奪產金地而發生糾紛，並且顧慮如果一時姑息，將產金區劃分為許多小區時，可能會影響礦脈之完整，難以從事大規模之機械化開採。故以雞籠山為界，規劃西邊九份礦區為礦一號，東邊金瓜石為礦二號，自申請者中選擇最佳人選，核給採礦權，承辦採掘工作。申請者則限於擁有日本國籍者，而當時臺灣人大多國籍未確定（兩年內可自由選擇日本或中國籍），因此悉遭摒棄。10月8日，「藤田合名會社」（社長藤田傳三郎）取得九份礦一號之礦權；同月26日田中長兵衛取得金瓜石礦二號礦權。二人皆為日軍征臺時的「御用商人」，²供應日方軍需，故此可謂臺灣總督府（或許是日本政府）的酬庸他們，也可窺伺到日本商人與軍政當局的微妙關係。

當時治安並不良好，1899年抗日民眾湧進九份礦區小粗坑，每夜

2 臺陽股份有限公司六十週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編，《臺陽公司六十年誌》（臺北：臺陽股份有限公司，民國67年，1978年），頁35 - 36；齋藤讓，《瑞芳及金瓜石礦山視察報文》（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1900年），頁39 - 40，頁48；富田榮次郎、村田雄之助，《九份金瓜石兩礦山基隆川筋砂金場礦業視察復命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號00004535008）。關於藤田傳三郎，可見司馬嘯青，《櫻花、武士刀—日本政要與臺灣五大家族》（臺北：自立晚報，民國77年，1988年），頁79 - 84。又，同氏，《臺灣五大家族》，上冊（臺北：自立晚報，民國76年，1987年）中的「基隆顏家篇」，頁11 - 80，則描述其崛起、事業規模、傳家哲學和顏家才俊，再者，臺灣礦業會志修志委員會（編纂唐羽），《臺灣礦業會志》（臺北：中華民國礦業協進會，民國80年，1991年），頁750 - 753，簡介藤田傳三郎和田中長兵衛。

槍聲不息，人心不穩，藤田組瑞芳礦山所長代理近江時五郎走訪瑞芳警察署，希望署長永田綱明推薦熟諳日本語而又有能力承包採掘金礦工程的臺灣人，署長乃推薦了該署「巡查補」兼守備隊翻譯的顏雲年（1874 - 1923年）。於是顏雲年在永田署長的諒解之下，以留職的身分和當地有力者共組「金裕豐號」，承包小粗坑礦權，開始砂金之採收。同時開設「調進所」，負責調度供應藤田組的物資和勞工，致力於緩和當地居民的人心，扮演橋樑的角色，因而得到日人和臺人的信任。翌年又組織「金盈豐號」來承包大粗坑和大竿林一帶礦區。並為了防止瑞芳產金之流失而成立「金盈利號」（後改名金裕利號），以收購零碎採集的砂金。

此後，雲年繼續擴展所承包的礦區，在1906年設立「金興利號」，將「金裕豐號」和「金盈豐號」併入其內，進一步自砂金採收事業發展到新礦坑的挖掘事業，到1909年，他所經營的礦區已達九份金山總面積的90%。³

5年後的1914年，「藤田組」因瑞芳坑口零散，礦脈不整，管理困難，含金品位低降，以既有的設備已無法平衡收支，乃將全部礦山租借給顏雲年，於是顏氏以7年30萬圓，分期付款的方式，終於在從事金礦業15年之後，取得了管理全權。他除了精心直營「金興利號」礦區外，將其餘地區分別轉租7家，並以「氰化製煉法」冶煉藤田組時代廢棄於坑外的貧乏礦石以得遺利。群策群力的結果，產金量居然於翌（1915年）超過了藤田組經營時代的最高記錄的539,126公分（1904年），而達650,637公分，1917年更高達789,134公分，⁴締造了九份產金地區的鼎盛時期（參見附表1）。

再者，顏雲年早於1903年，即與蘇源泉等人共組雲泉商會，繼續發揮以往「調進所」的供應物資和勞力的功能，業務逐漸進展，而於1907年和1910年進一步供給木村久太郎所經營的武丹坑礦山（1901年

3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基隆：友聲會，1924年），頁25 - 29，他於1896年即奉命當瑞芳守備隊的翻譯，見同書頁15 - 17。

4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頁29 - 31。吉永勘一郎編，《瑞芳礦山概況》（臺北縣瑞芳：臺陽礦業株式會社瑞芳坑場，1933年），頁2，頁7 - 8。

左右發現），和田中長兵衛所經營的金瓜石礦山之一切物資和勞工，並同時兼營搬運業，⁵因此可以說顏家於20世紀初期即掌握了當時臺灣三大金山的勞工和必需物品與器材，才能累積資本在1914年承租藤田組所有金礦。

另一方面，其他兩大金山的產量亦急增，是九份金山產量的3倍多。但在1913年，其經營權發生變化，亦即金瓜石礦山合併武丹坑礦山。木村久太郎自從經營武丹坑金礦以來，獲利頗多。此乃因該處的富礦體規模龐大，每年都有大量產金。但因富礦體綿延至金瓜石礦山，木村於是越界採金，遭到金瓜石礦山方面嚴厲抗議，並要求賠償。由於當時木村還同時在基隆田寮港經營煤礦，情況亦佳。木村在感受到經營金礦之煩及礦業糾紛之苦後，遂在1913年將武丹坑礦山的經營權，轉讓給金瓜石礦山。⁶

顏家事業進一步發展是在1918年3月，首先，雲泉商會改為株式會社（公司）組織，由其弟國年（1886 - 1937年）擔任社長，資本20萬圓；同年10月以30萬圓收買藤田組在瑞芳的全部礦權，並統一經營「金興利號」、「金裕利號」等行號和九份的土地、輕便鐵路事業，資本增為150萬圓，改由雲年自任社長。兩年後，瑞芳金山轉移至臺陽礦業株式會社（同年成立，資本500萬圓）的管理網絡之中，⁷於是臺陽株式會社乃成為掌握金、煤兩礦之一大企業，開創臺灣人在殖民地時期經營礦業的新紀元，也是「臺灣五大家族」之一的顏家的一象徵。並與日人後宮信太郎經營的金瓜石礦山株式會社（乃金瓜石和武丹坑二礦山合併後，於1925年自田中礦山株式會社轉移而來，後為日本礦業株式會社收買，1933年改名臺灣礦業株式會社），⁸分霸臺灣金礦界。

1923年雲年去世後，國年繼續乃兄之遺志，全力開發礦區，並引

5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頁52 - 53。

6 林朝榮，〈臺灣之金礦業〉，收入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編，《臺灣之金》（臺北：臺灣銀行，民國39年，1950年），頁34；林興仁主修，盛清沂總纂，《臺北縣志》，卷21，〈礦業志〉，頁72 - 73；黃清連，《黑金與黃金》（臺北板橋：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頁138。

7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頁53 - 54；《瑞芳礦山概況》，頁2。

8 島田利吉，〈金瓜石礦山の概況〉，《科學の臺灣》4：6（臺北，1936年12月），頁2；林朝榮，〈臺灣之金礦業〉，收入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編，《臺灣之金》，頁30 - 36，頁39。

進新技術，1926年建設新型浮選廠和機械選礦廠（參見附圖2）；繼而開鑿以鋼鐵為支柱、鋪設電動鐵軌以搬運礦石的現代化硐道（1933 - 1936年），並將所產粗金送到日本造幣局製煉，統一品位。1937年國年過世，雲年長子欽賢繼任。適逢日本政府頒佈產金法以配合急增之軍備，此為獎勵黃金之基本法令。

在獎勵產金的策之下，金礦之探勘、採掘、搗碎和冶煉等新工程設備，均可領取鉅額補助金。翌年，隨著中日戰爭的進展，總督府再訂獎勵產金政策，逐年增加補助金；並且禁止黃金自由買賣，由臺灣銀行全權負責收購黃金，每公兩補貼52圓（公價142.31圓，故補貼為公價之36.5%）。而瑞芳現代化之機械選礦廠第1、2、3期工程亦分於1937 - 40年完成，臺陽公司產金量在1937 - 38年達到顛峰，日本政府於同時期陸續在臺收購黃金高達70公噸，臺灣總督因此得到日皇的頒獎。

好景不常，瑞芳地區的主脈採掘殆盡，九份的黃金產量開始減少，包工逐漸星散，而且精壯員工亦被殖民地當局徵召服勞役，勞工嚴重缺乏。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國際貿易中斷，黃金已非交易工具，殖民地政府乃於1943年2月指示臺灣電力公司收購瑞芳礦業所的氰化廠、架空索道，交由海軍使用，故該金礦全面停止生產。金瓜石礦山亦被迫停工。1944年更根據「臺灣決戰非常措置要綱」，強行徵用現代化選礦設備，⁹於是50年前的一大金山在戰備政治風雲的籠罩下化為廢墟。

二、煤礦業

除了金礦之外，顏家亦經營煤礦的開採事業。居住在基隆的顏雲年目睹殖民地當局於20世紀初期開始基隆築港計畫，預測隨著海運業和各種工業的發展，作為燃料和原動力的煤炭的需求市場勢必擴大，故非開發各地的煤礦不可。所以請其弟國年策劃經營，於1904年取得三瓜子煤礦（現在瑞芳車站前）的開採權，此後陸續得到猴硐、瑞芳一帶及深

9 臺陽股份有限公司六十週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編，《臺陽公司六十年誌》，頁38 - 39；林朝榮，〈臺灣之金礦業〉，收入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編，《臺灣之金》，頁38 - 40，頁42 - 43。

澳、石底、五堵、三峽、板寮等處的採礦權，其礦區共計60多處，占有了臺灣北部煤礦區的主要部分，所出產的煤炭品質堪稱優良。¹⁰

其中最值得注目的是自基隆三貂嶺經平溪鄉石底到文山郡十八重溪綿延1,480萬坪，分布為12個礦區的石底煤礦廠。其平溪部分的採煤權本屬平溪望族潘炳燭所有，後來讓給藤田組（1908年）。經試掘後，發現雖然煤質良好，但該地處於重山萬嶺之間，交通不便，人煙稀少，勞工和運輸問題均不易解決，非集巨資不可，收益很難估計，所以開採工作遲遲沒有進行。直至1918年6月，經潘氏說服，顏雲年乃與藤田組共同出資100萬圓組織臺北炭礦株式會社來開發，藤田組擁有60%的股權，顏氏有40%，¹¹昔日的礦權主與承包商關係終於轉變為合夥關係，同年10月顏雲年更進一步收買了藤田組在瑞芳的金礦權。兩年後（1920年4月），藤田組因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不景氣的影響，而無法繼續在臺的事業，遂將所持有的臺北炭礦株式會社的股份，全部讓售顏雲年。雲年和賀田金三郎、木村久太郎及林熊徵協議後，增資為500萬圓，同年9月改名臺陽礦業株式會社，以賀田金三郎為社長。¹²開始了獨霸臺灣煤礦界的時代。

顏家並非僅以「臺陽礦業」的煤產即可稱霸煤礦界，另擁有一公司——基隆炭礦株式會社，此公司係顏雲年以其59個礦區提供給日本三井財閥而於1918年9月增資成立的。該公司的煤產量約佔臺灣全省之半，如與臺陽礦業的產量合併計算，則約佔全省總產量的三分之二，故時人以炭王金霸稱之。¹³

兩大資金系統分別成立後，臺陽礦業致力於石底礦廠之開發，石底礦坑場長由日人擔任，由於煤層狀態富於變化，無法集中於一個坑口開採，須遷就煤層狀態而分區採礦以獲取最大之效益。並且此處山巒重

10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頁36 - 37，頁48；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13。

11 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19 - 20；臺陽股份有限公司六十週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編，《臺陽公司六十年誌》，頁47。

12 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20；臺陽股份有限公司六十週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編，《臺陽公司六十年誌》，頁47 - 48，臺陽並且同時接管「雲泉商會」的瑞芳金礦。

13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頁51 - 52；臺陽股份有限公司六十週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編，《臺陽公司六十年誌》，頁48。

疊，如何搬運所開採出的煤炭為一大問題。當時討論的方法有二：一為架設鐵索，一為敷設石底和三貂嶺之間8哩多的鐵路以連繫宜蘭線（官方敷設的鐵路）。前者的工程較易、花費較少，但效果只止於運送煤炭而已；後者則需要巨額的費用，一旦完成卻有助於地方產業的開發。顏氏衡量輕重後，排除萬難，決定著手敷設鐵路。即使在1920年藤田組退出該公司後，亦沒有中斷，總共投入330多萬圓的工程費，於1921年7月竣工。¹⁴

平溪鐵路的完成刺激了石底礦廠的開發，產量突增，自1919年的5,705公噸增至1922年的137,996公噸，在全省煤產量（見表2）中的比例，則自0.5%上昇為10.2%。當時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經濟恐慌的餘波蕩漾，一般工業皆凋零，對燃料的需求亦不多，所以煤價不高，銷路亦呆滯；幸虧運煤便利，成本低廉，故雲年仍不斷挖採，並尋求開拓市場。由於臺灣境內銷售有限，乃委託株式會社鈴木商店代銷華南、東南亞及其他海外市場，¹⁵企圖利用鈴木商店既成的銷售網絡來推廣臺灣煤的使用領域。

1925年，為了統制生產，顏家將石底各坑的經營委託基隆炭礦株式會社，其販賣則委託三井物產會社，¹⁶由於基隆炭礦的60%名目上係三井物產和三井礦山株式會社共同出資的，故可以說三井財閥掌握了顏家煤礦的生產與銷售大權。但3年後的1928年即解除基隆炭礦會社的委任經營權，由高文孝等組織的「昭和採炭株式會社」承包採掘工程；1930年又取消其承包權，而改為直營制；並更新採煤技術，廢止已達極限的蒸汽動力，將坑內外的各機械全部電力化，強化石底大斜坑的設備，使自十分寮至十八重溪各坑的煤田之煤炭能集中於石底大斜坑生產，以延長礦坑的生命。1937年，更進一步利用機械取代人工之採煤，鋪設架線式電車以便坑內水平搬運，其目的在於增加產量和降低生

14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頁57-58；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19-21；臺陽股份有限公司六十週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編，《臺陽公司六十年誌》，頁48。

15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頁59；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21；臺陽股份有限公司六十週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編，《臺陽公司六十年誌》，頁48。

16 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21-22。

產成本。¹⁷

至於品質改良方面，於1933年12月在石底煤礦新坑口裝設機械選煤機（Baum式水洗機），代替往昔的手工洗選煤，每小時洗煤15噸；1935年12月再添設每小時洗煤25噸的同型機械，以提高品質而在市場博得佳評，這些提高產量和品質的相關知識皆是顏國年於1925年4月初至10月底，以221日的時間考察歐美16國所體驗到的，¹⁸亦可以說他站在舊有的基礎上來應用現代化的技術，從而產生技術革新，使傳統的產業得以出現新面貌。

同時，他亦改善海山煤礦（在今新北市三峽、鶯歌一帶）的生產設備，架設高壓送電線，將蒸氣動力電力化，並敷設2哩長鐵軌，以小型火車載運該礦場所出產的煤炭到中央貯煤場。再進一步開鑿海山大斜坑，企求全面採掘煤量豐富、煤質優良的煤田。¹⁹

石底和海山兩煤礦是顏家煤礦業的重心，顏氏之所以致力於改良其生產設備則是為了適應時代的需要。因為煤炭既然是當時工業和海運的原動力和燃料，故其需求市場之大小決定於經濟之是否繁榮，價格則視世界產煤總量而定。臺灣當時工業尚未發達，煤炭主要供糖廠燃料和輪船動力之用，到1935年以後，由於肥料、鹼業、硝酸等工業開始出現，臺煤的內銷市場乃擴大；另一方面，臺煤輸往日本者並不多，就日本的殖民政策而言，早期鼓勵臺灣煤礦業的目的是讓臺灣的工業燃料能夠自給自足，中期則使臺煤能外銷華南和東南亞地區，以填補「日本煤業帝國」的空白之處。由於日本煤質優於臺煤，所以其本土並不太需要臺煤，因此臺煤乃成為日本經濟侵略華南和東南亞的工具。到了後期，軍需重工業的發展和侵略戰爭的進行，使臺煤產量因需求之擴大而大增，故供給日本本土工業和輪船軍艦的數量亦顯著增加。

臺煤的華南市場曾受到中國政治外交環境的影響，例如，1926、1927年國內發生反英運動，香港廣東方面拒用開灤煤，紛向臺灣購

17 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22-24。

18 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24；頁102-117。他在歐美不僅參觀礦廠，還考察油井、電動屠宰廠、電機製造廠、肥皂製造廠等當時的新興產業。

19 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25-26。

煤，刺激臺煤之生產，使1927年產量高達185萬多公噸。1年後的濟南慘案則激演變成反日高潮，臺煤外銷大受影響，貯煤滯銷日甚，大小煤礦為處理其滯銷煤炭而削價拋售，煤價因此暴跌。²⁰而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操縱東北之政經，質優的撫順煤大量輸往日本，甚至廉價傾銷臺灣，原本已因受世界經濟不景氣之影響而蕭條的臺灣煤礦業更面臨空前之危機（因就日本帝國而言，撫順煤和臺灣煤同屬殖民地之產物）。此時，居業界中樞地位的顏國年乃率領業者代表，逕往日本本土請願，經其折衝口舌、侃談利害，運用他和政界財閥的關係，終於使日本政府認識到在中國反日風潮日熾的情況下，撫順煤能否長期輸日亦極可虞，故決定限制撫順煤輸日，並准臺煤優先輸入，解決了臺灣煤礦業的生存危機。²¹

經此慘痛教訓，停業或廢業之煤坑頻頻發生，臺陽公司則如前所述，以工作面之集中、坑內工作之機械化、採煤之科學化和運輸工具之改良等方式來降低成本、增加產量和提高品質。配合著日本重工業的殷盛、海運日興和臺灣境內的工業化，對燃料煤的需求大增，而能得到豐碩的成果。當時鐵路、臺糖、臺鋁、臺泥、窯業公司的燃料，以及日本郵船、辰馬、山下、川崎等會社所屬輪船之所需燃料煤，皆由該公司供應。該公司除了銷售自產之煤外，並經銷其他礦坑所產的煤。²²這固然因該公司已建立了較完整的經營網絡，但未嘗不是由於顏氏本人在臺灣金、煤兩礦界的屹立不搖地位，而此地位則與當時日本（臺灣總督府）當局的培育息息相關。

再者，日本的礦業政策呼應著其政治軍事情勢，1937年1月曾在臺灣總督府召開「臺灣資源調查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除了報告日本本土總動員準備的概況外（自1926年即著手進行），並明示對臺灣的期待：全面禁止輸出煤炭到中國、實施煤炭和石油的增產計畫乃至統制之，利用臺灣熱帶氣候的特性，栽培軍用和藥用植物，戰時以臺灣

20 臺陽股份有限公司六十週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編，《臺陽公司六十年誌》，頁48；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日據時代臺灣經濟史》，第二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47年，1958年）第6章，「礦業經濟」（作者為周憲文），頁181。

21 臺陽股份有限公司六十週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編，《臺陽公司六十年誌》，頁49。

22 同上，頁49。

為中繼站，補給軍艦到東南亞的燃料和物資，並利用戎克（Junk為西洋16 - 17世紀的帆船。日本明治維新後譯為戎克船，中國人也照譯，是運輸的帆船）等，自東南亞輸入物品到臺灣再運至日本。²³所以在會後，繼1936年日本本國煤炭的統制，進一步強化臺灣煤炭的統制，此時被三井財閥稱為「臺灣煤業之父」的顏國年則配合此政策，奔走各大小礦廠，制定早於1933年即已成立的「臺灣炭業組合」（臺灣煤礦業公會）的各基本規則，使其成為名符其實的強化煤礦業統制的公會，²⁴同時他亦致力於煤炭商公會之出現，以謀求供需雙方緊密連繫，從而能得到合理的煤價。²⁵

當初「臺灣炭業組合」成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能使臺灣所有煤礦有計畫的生產，以對付來自島外的大資本的撫順煤的競爭，這也是顏氏的卓見。在1920年代後期30年代初期臺灣煤礦業不景氣、小礦廠相繼休廢、餘存者亦僅能殘喘於破產邊緣時，顏國年鼓吹大小礦廠團結以減低生產成本，加強臺煤整體的競爭能力，提議成立煤礦公會。但固然有支持者，亦有的大礦廠為爭私利而反對，卻又出現大資本經營之攻擊論者²⁶（當時資本100萬圓以上的公司僅有12家，除了顏氏外，皆為日本人主持，即使顏氏之基隆炭礦亦歸屬日資，這些公司的煤產額約佔總產量的65 - 80%），²⁷在此大礦與中小礦間意見相左之際，顏氏協調不已。適逢日本政府於1932年12月對臺頒佈「重要物產同業組合法」，由於公權力的介入，故翌年4月乃能正式經臺灣總督府准許設立「臺灣炭業組合」，其宗旨在「開發地下資源，以配合政府經濟建設計畫，而促進本島經濟繁榮，並謀劃礦業之改良，增進及謀求同業之共同利益」。²⁸此組合在1937年後日本統制臺灣煤炭的政策中發揮了擴大生

23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資源調查委員會第一回委員會議事錄》（臺北：臺灣總督府，1937年1月，係屬秘件）。該會分三部，分別探討一般關係、燃料和醫藥品關係、港灣關係等。因與本書無關，故只總結其主要大綱。

24 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152 - 154。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高雄支店長池田卓一對於顏氏的弔辭。

25 同上，頁18 - 19。

26 同上，頁18。

2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日據時代臺灣經濟史》，第二冊，第6章，「礦業經濟」（作者為周憲文），頁181 - 182。

28 臺陽股份有限公司六十週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編，《臺陽公司六十年誌》，頁50。

產的功能，如能與煤炭商公會合作，則臺煤產銷均在殖民地政府統制之中。就此意義而言，顏國年在日治時期的殖民地政府和民間之間扮演著橋樑的角色。

國年去世後，顏欽賢繼續扮演此角色，因受戰爭影響，所以1937 - 41年臺煤生產劇增，顏家企業宛如日正當中，²⁹石底煤礦區不斷擴大，礦工不斷增多，乃於1939年興建礦工住宅，1940年自行舉辦「礦工技術者養成所」和「瑞芳礦山機械工養成所」，以培養技術人員，充實臺陽公司的實力。1941年，殖民地政府以公權力進一步強化煤炭統制，成立「臺灣石炭株式會社」，統制購買臺灣所有產煤。但仍指定日資三井、三菱商事、臺灣炭業、臺灣產業等會社和臺陽公司為煤炭批發商，負責銷售給消費者（包括家庭和工廠），所以臺陽公司仍能與日資公司並肩齊驅。隨著戰爭的延長和戰區的擴大，總督府乃於1943年底根據「戰力增強企業整備要綱」，要求煤炭業者傾力增加此戰備物資的生產。於是，臺陽日籍領導階層為求邀功，強採防水煤壁，再加上盟機炸燬發電設備，電力輸送中斷，以致地下水浸沒下層礦坑，坑道崩塌，採礦工程癱瘓。³⁰於是和金礦的命運一樣，煤礦的採掘事業亦在空前的戰雲密佈之下暫告結束。

三、交通運輸業

除了礦業之外，顏家亦經營交通運輸業，最著名的是基隆輕鐵株式會社，該公司的成立與顏家所重視的礦業息息相關。由於臺灣北部山岳重疊，崎嶇難行，往來商旅大多必須徒步或乘轎；而貨物的搬運則只能依賴人力肩挑。隨著瑞芳、金瓜石和武丹坑三金山的開發，交通日漸頻繁；並且這一帶又蘊藏著煤炭，勢必大量採掘，於是運輸問題的解決乃成為當務之急。雲年因此和日人木村久太郎、近江時五郎等人集資50萬圓，於1912年設立基隆輕鐵株式會社，於次年11月完成基隆三瓜子之

29 顏家關係企業除了兩礦業公司之外，日治時期另有：基隆輕鐵株式會社、海山輕鐵株式會社、臺灣興業信託株式會社、基隆商工信用組合、瑞芳營林株式會社、株式會社雲泉商會、株式會社中日銀行、基隆船渠株式會社、瑞芳輕鐵株式會社、禮和商行、義和商行等15家公司。

30 臺陽股份有限公司六十週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編，《臺陽公司六十年誌》，頁52。

間的輕便鐵道敷設工程，12月開始客貨的運輸。此後該公司不斷的改良設施以增進輸送能率，即使1919年鐵道部的宜蘭官線開通後，煤炭也都依賴此私營的線路來運輸到基隆碼頭。換言之，隨著煤炭生產的增加，此輕便鐵路的存在價值更加重要。

不僅是為了煤炭的運輸而敷設輕便鐵路，1923年雲年過世後，繼承事業的國年也應基隆郡當局和金山萬里兩庄民的要求，著眼於當地的產業開發，投下30多萬圓的巨資，在1927年10月開始基隆金山本線與觀音町木山間支線的輕便鐵路敷設工程，而於1930年2月竣工。

因為瑞芳和金瓜石金礦的勃興，顏國年乃於1930年7月著手敷設兩地之間的輕便鐵路，開鑿險峻的山腹，於深谷埋設線路，克服艱難的障礙，終於在1932年竣工，10月開始營業。

國年更進一步花費20多萬圓去修築瑞芳基隆間的汽車道路。以往基隆金瓜石之間的交通是先攀登峻嶺，再跋涉羊腸小道，大約要花費半天的時間。經過顏家的整頓後，只需50分鐘即可抵達目的地，不但有助於九份和金瓜石兩金山的發展，更增進一般民眾行的方便。³¹

顏家事業不僅止於礦業和交通運輸業，其關係企業尚有：雲泉商會、海山輕鐵、瑞芳營林、臺灣興業信託、臺灣拓植製茶、東洋木材、臺灣水產、金包里礦業、大正興業、基隆船渠、臺灣驛傳社、臺東拓植、基隆商工信用組合、南洋倉庫、振南貿易、臺東製糖、臺灣電氣工業、臺北鐵道、臺灣肥料等株式會社和華南銀行。換言之，他們在二十世紀初期，以煤金兩礦業發跡，累積了不少資本，乃轉投資於商業、交通運輸業、茶業、水產業、金融業、製糖業和電氣業等，展開多角化的經營。而這些企業大多是與人共同經營的，其中也有姻親的投資。

參、顏家對地方的貢獻

顏家在基隆一帶的名望，是從橋樑角色逐步建立起來的。

31 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33-37。

一、橋樑角色

雲年原本在藤田組的角色是扮演日本管理階層和臺灣勞工階層之間的橋樑。在此之前，他擔任瑞芳警察局的「巡查補」（為日本巡查/警察的輔助人）和守備隊翻譯，主要任務是協助調解日軍和當地民眾之間的紛爭。因為當時抗日人士仍然活動不已，如果不加辨明，日軍或有濫殺無辜的情形發生。所以他當初雖在瑞芳守備隊長的嚴命之下，以一家族的代表來擔當此重任，卻逐漸認識到為了使社會安定、了解日本和日本人、保護當地民眾的安居樂業，非排除萬難努力以赴不可。³²因為在1896 - 97年之際，臺灣民眾尚不能臣服於日本之殖民統治，大多只求自保，或許可能會以有色的眼光來看待顏氏的工作，所以他必須以非常的勇氣和智慧來擔任此中介角色；也因為此機緣，他得以進入藤田組，進而創立事業。因此，他能夠扶植在當地的根深蒂固的潛在勢力，使殖民地當局刮目相看，顏家乃能成為日治時期的顯赫家族。

在業界方面，從大資本的煤礦公司兼併中小資本煤礦廠的過程中，亦可以看到顏家所扮演的角色。例如顏家與三井財閥合資的「基隆炭礦株式會社」在1919年7月經顏國年「當事務之衝」，合併「木村礦業株式會社」；³³8月收買芳川寬治所經營的「臺灣炭礦株式會社」，實現了三井財閥多年來欲統一臺灣煤業界的計畫，³⁴國年所扮演的中介角色日益重要。基隆炭礦並增資為1千萬圓，如前所述，該公司的煤產量約佔臺灣全島之半，如與臺陽礦業和木村礦業產量合併計算，則約佔全省總產量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³⁵而在1925年，顏國年將臺陽礦業公司之軸心平溪石底礦廠各坑委託基隆炭礦會社經營，煤炭之販賣則委託三

32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頁15 - 17。

33 〈木村礦業讓渡〉，《臺灣日日新報》6755號（臺北，1919年4月8日），版5；〈礦業會社解散〉，《臺灣日日新報》6840號（臺北，1919年7月2日），版3。

34 〈炭礦合併〉，《臺灣日日新報》6869號（臺北，1919年7月31日），版3。

35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頁51 - 52；臺陽股份有限公司六十週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編，《臺陽公司六十年誌》，頁48，故時人稱雲年為炭王金霸。再者，據《臺灣日日新報》6625號（臺北，1918年11月29日），〈炭界統一之謀〉云，在該年全省煤炭產量約75萬噸，三井擁有50萬噸之多，占三分之二；而合併木村礦業後，掌握於基隆炭礦會社者占本島煤炭界之75%（見〈兩社之合併〉《臺灣日日新報》6835號（臺北，1919年6月27日），版5。

井物產會社，³⁶由於基隆炭礦的60%的股權名目上係三井物產和三井礦山株式會社共同出資的，故可以說三井財閥掌握了顏氏所擁有的煤礦的生產與銷售大權，也因此控制了臺灣礦業。

至於合併臺灣炭礦會社之舉，亦由顏雲年出面與其社長芳川寬治交涉，芳川所持股票以每股60圓之價讓售給基隆炭礦會社，所有三井系統以外的股東皆辭去董事、監事、或管理階層的職位。³⁷其實，早在1917-18年之際，雲年即為了爭奪四腳亭煤礦的經營權，而收買臺灣炭礦會社的股票，幾與芳川平分秋色（總共2萬股中，顏雲年與芳川各持股8,257股和8,973股），亦因此膺任董事，國年則為監事。後來因顧全大局而一時與芳川妥協。³⁸但畢竟臺灣炭礦會社與基隆炭礦會社之礦區有毗連之處，合併之後比較方便經營，所以無論三井財閥或顏家，都希望能將該社納入自己的領域之中，當時輿論界則認為「至此三井多年之計畫臺灣炭界統一，漸為實現矣。」³⁹換言之，顏家的角色在1920年之前被認為是三井意欲自煤炭輸出商變為煤礦經營者，由商業資本轉為產業資本型態，進而掌握臺灣煤礦業的有力助手。

再者，經由藤田組和三井的扶植，顏家乃能異於當時臺灣其他著名的大家族，自始即以企業家的身分出現於歷史舞臺，成為殖民地當局籠絡的新貴。除了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外，如前所述，國年甚至被推舉為1930年代統制經濟時期所成立的「臺灣炭業組合」（臺灣煤業公會）之理事長，以「臺灣煤業之父」⁴⁰的身分，在殖民地政府和民間之間扮演著橋樑的角色。

二、基隆博愛團的創立

顏家的影響力逐漸向外擴展，向上部統治階層延伸。由於事業的成

36 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21-22；《三井物產取締役會決議錄》，第375號（日本三井文庫所藏史料，編號物產2035，1925年4月10日）。

37 〈炭礦合併〉，《臺灣日日新報》6869號（臺北，1919年7月31日），版3。

38 陳慈玉，〈日本殖民時代的基隆顏家與臺灣礦業〉，收入《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642。

39 〈炭礦合併〉，《臺灣日日新報》7276號（臺北，1920年9月10日），版6。

40 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152-154。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高雄支店長池田卓一對於顏氏的吊辭。

功和樂於捐獻給公共事業與慈善機關，他在臺灣北部民間的聲望極高。其中最值得注目的是1920年財團法人基隆博愛團的創立，其目的是為了緩和基隆市住宅不足的現象，以收容勞工階層（當時基隆一帶工商業發達，來自外地者頗多），俾利於治安和衛生。當時的《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如下：⁴¹

基隆博愛團許可

寄附者北部三富豪

建築家屋以貸附。及維持慈善恤諸事業。而設財團法人基隆博愛團。12月23日。以今川淵、西岡健之、顏雲年、林熊徵、辜顯榮五氏。總督府申請認可。昨既許可之本其基金35萬圓中。寄附之者。則顏氏20萬圓。林氏五萬圓。辜氏10萬圓。近且欲著手建築矣。

由此可知臺北廳長梅谷光貞向顏雲年、辜顯榮和林熊徵三氏預約捐款，分別為20萬圓、10萬圓和5萬圓，以廳長以下各相關官吏為博愛團理事。不僅止於此，根據同報的記載，雲年還擔負了重任：⁴²

為博愛團提供擔保百萬圓。基隆街長國府小平氏語曰。基隆公共長屋建築財團之博愛團。此次由同團理事顏雲年氏之發奮。提供自己財產按價百萬圓。付臺銀為擔保。借出低利資金39萬5千圓。以實行既定計畫。先欲建築二棟。其餘一棟。待顏雲年林熊徵辜顯榮三氏之寄附金殘額23萬圓。全部繳納後。再行建築該博愛團為救濟基隆住宅困難。以顏林辜三氏之寄附金35萬圓為基金而設者。顏氏已繳10萬圓。林氏亦繳2萬圓。其他借出低利資金10萬圓。以此等為資本。購入用地。建築假收容所。後因寄附金緩繳。而低利資金之借用。亦不如意。不得已中止事業然基隆街之為住宅所苦者。日益加甚。公共長屋之建築。實刻不可緩。原籌借低利資金殘額39萬5千圓。以之為街債。照博愛團設計。建築公共長屋二

41 〈基隆博愛團許可〉，《臺灣日日新報》7038號（臺北，1920年1月16日），版6。

42 〈顏雲年氏之美舉〉，《臺灣日日新報》7439號（臺北，1921年2月20日），版5。

棟。然借款不能無擔保品。顏雲年氏佑之。以一片義俠心。提供擔保品。借彼低利資金殘額全部。仍為博愛團事業。著手建築。博愛團理事者與臺灣銀行之間。亦既諒解。顏雲年氏對於公共事業。每次熱心為之。其美舉洵令人感激也。

換言之，由於急需，故顏雲年首先捐出10萬圓，林熊徵也捐助2萬圓，顏並且將其所有的邸宅、土地、建築物無償提供擔保，向臺灣銀行貸款39萬5千圓，以供購買博愛團的建地和建築之用。於是「著手興工。其工事為雲泉商會。材料供給紅毛土為三井。煉瓦為臺煉瓦會社。木材為小松利三郎等包辦。」⁴³到1922年8月已花費了建築「工事費11萬5,169圓。內除煉瓦紅毛塗地基用杉木等。當團供給。由中谷某辦。其構造磚石三階。建81間。」⁴⁴

博愛團的房間是出租的，《臺灣日日新報》有比較詳細的記載：⁴⁵

基隆博愛團玉田街公共長屋一棟。計百92戶。賴顏雲年林熊徵兩氏外一人義捐。其工事近已告竣。建物為煉瓦構造。三階方形宏壯之西洋館。建築費17萬圓。敷地10萬圓。將於此一二日出租。二階三階之借家料。每室約五圓。而炊事場。便所等。則共同使用。據聞顏氏於此番義舉。非常盡力。於寄附額20萬圓之中。交出10萬圓。林氏亦於寄附額五萬圓中。交出2萬圓。同團窮於利資金之借人故顏氏特提供私有財產約百萬圓。向銀行擔保。借出45萬圓。內三棟之中。先一棟告竣云。

所以，顏雲年總共向銀行貸款45萬圓。1922年10月14日終於完工，可容納66戶，有庭院和運動場等的設施：⁴⁶

公共長屋落成 既報博愛團建築公共長屋。去14日舉行落

43 〈基隆公共長屋〉，《臺灣日日新報》7663號（臺北，1921年10月2日），版5。

44 〈博愛團工事〉，《臺灣日日新報》7982號（臺北，1922年8月17日），版6。

45 〈基隆街公共長屋〉，《臺灣日日新報》8030號（臺北，1922年10月4日），版6。

46 〈公共長屋落成〉，《臺灣日日新報》8045號（臺北，1922年10月19日），版6。

成式。兼報告事業經過並開茶話會同團基本金。由顏雲年氏寄附20萬圓。辜顯榮氏拾萬圓。林熊徵氏5萬圓。建築敷地。總坪數2,061坪餘。土地買收費。合雜費拾7萬6,201餘。於昨年9月15日。以豫算工費拾6萬6,590圓餘。歸雲泉商會工業部包辦。構造臺灣式三階建。各階22戶。計66戶。附屬公共炊事場運動場。又階下有庭園等。現已出租。其屋賃比普通住宅。有三成之廉云。

由於博愛團係慈善團體，房租低廉，銀行貸款利率卻頗高（年率6分5厘），故收支不能平衡。當初預定捐款數額又因為適逢經濟不景氣而無法湊齊，只有顏國年目睹其經營困難捐助500圓，所以一共收到捐款12萬5百圓，建築費等共支出16萬6千多圓，顏家提供擔保向銀行借貸的45萬圓也因為收入和捐款不足而無法償還，此擔保亦不能解除。經由國年的努力折衝，終於到1935年才自「遞信省簡易保險積立金」（郵政簡易保險）低利借入資金來償還銀行的貸款，解除了顏家邸宅等的擔保。同時，顏家又捐出1萬5千圓，辜顯榮和林熊徵則各捐獻1萬圓和5千圓。⁴⁷故可以說基隆博愛團的設立完全是顏家的功勞。由於對公益事業的重視和家族企業的成功，因此他們能成為殖民地政府和當地民間社會之間的鞏固橋樑，得以在臺灣總督府評議會中針對臺灣公共建設、產業發展和教育問題侃侃而談。

肆、顏家對文化教育的重視

顏雲年、國年兩兄弟先後於1921年6月和1927年9月被選為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們針對該會所提出的各項詢問案，坦誠發表自己意見。在此僅針對文化教育建設方面來析論。

47 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45 - 51。

一、文教建設的見解

顏家非常重視學術文化教育，雲年曾促成瑞芳公學校之開設，並捐助5萬多圓以增築基隆公學校之校舍。⁴⁸而且在1921年所舉行的評議員會中提出他對義務教育的看法，他認為義務教育所需經費高達1億圓（如果繼續10年），必然會來自稅收而增加臺灣人的負擔，但此為世界大勢所趨，不得不實施。卻可從精減經費著手，所以他主張義務教育期限為4年，經費則可減少20% - 30%，其方法是刪減校舍建築費，即把日本人進的小學校和臺灣人就讀的公學校合併於同一校園內，校長亦同一人，則經費自然減少。因為他認為在同一市區內，有小學校和公學校之分是非常不經濟的，如能將其合併，校長又能對日人和臺人一視同仁，毫無差別待遇，則或許能成為日臺親善和睦的濫觴。固然剛開始實施時，由於原本的課程相異，語言不同，可分別僱用臺灣人和日本人老師來教導，俟日後程度一致時，亦可以修改課程，共席共硯，培養同窗之情誼，畢業後則可以到日本深造。⁴⁹換言之，他希望能在基礎教育方面爭取臺人和日人的平等待遇，而以縮減經費為說服殖民地當局的利器，可惜似乎沒有被採用，公學校和小學校依然獨立並存。

10多年後，顏國年在第8次評議員會（1935年6月）中再度強調對臺灣人實施義務教育的重要性。當時在臺日人有247,000人，臺灣人則465萬人，而小學校有134所，公學校有775所；學齡兒童就學率非常懸殊，即日人高達99.25%，臺人只有37.02%。⁵⁰他認為此現象與其說是文化程度的差異，毋寧可以說是制度上的缺陷。因為在1921年的評議員會中（即顏雲年提出卓見的會議），曾決議隨著地方自治制度的實施，應努力於初等教育的普及，但因為教育經費支出龐大和教員的缺乏，所以只得順應各地方團體的負擔能力實況而逐漸實施。但事實上，公學校數只從1921年的467所增為1935年的775所，可以說進展非常緩慢。

48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頁63，頁71 - 79。瑞芳公學校於1903年3月成立，基隆公學校則為現在之信義國小；光復後，顏欽賢於1969年捐獻九份土地1萬2千坪充當國中用地，政府定名為瑞芳欽賢國中，他並於基隆創設私立光隆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49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頁89 - 92。

50 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68。

所以他主張改變方式來加強臺人的基礎教育，亦即雖將初級教育定為六年，但義務教育以四年為限，五、六年級則併入小學校，故可廢止公學校五年以上的學級，則不但對財政的影響很大，所收的教育效果亦不小。⁵¹由此觀之，他承繼了其兄的看法，希望臺灣人能與日本人在初級教育方面得到平等的待遇，隱約質問殖民地當局以經費困難而不普及臺人的初等教育。

此種「臺灣應與日本本土平等」，而非殖民地的看法一直深埋內心，固然表面理由是培養臺人的「國」民精神，但實際則期待能因此提高臺灣民眾的資質、陶冶其情操、啟培其智識，以企求本土思想形態之改善與進步。⁵²

除了初級教育外，在1920年代末期，目睹工業的逐漸勃興，他意識到非培養其人材不可，所以主張在各州設一中級工業學校，南北部則各設一高級工業學校。⁵³到1935年的熱帶產業調查會時，工礦業已有相當的發展，益感臺灣人材之缺乏，他乃大聲急呼工業人材培育之重要性，當時工程師和高級技術人員仍以日本人或留學生居多，⁵⁴尤其是礦業方面，由於現場指導員不足和勞工訓練未純熟，因此礦災頻發，身為礦業界鉅子的顏國年痛感此現象，故建議在臺南高等工業學校（1931年設立）或臺北工業學校內併設採礦冶金學系，以最簡單可行的方法來改善工業教育之缺陷。⁵⁵這些建議頗受重視，到1930年代末期1940年代初期，由於戰爭需要，先後增設8所州立工業學校，以培養工業尖兵，增強工業戰爭力，並於臺北工業學校內設置礦冶學系。工業學校的教材以臺灣和日本實例為主，平易實用，並注重實習，頗能使學生學以致用。總計1912 - 44年間，畢業學生有4,119人（入學者10,926人），其中臺籍學生佔41%，在大學工學部尚未落實臺灣時（臺北帝國大學於

51 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67 - 69。

52 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69 - 70。

53 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66。當時臺灣人只能進公立臺北工業學校（1919年改組成立）。

54 陳慈玉，〈日治時期臺灣鹽業的發展－臺灣經濟現代化與技術移轉之個案研究〉，《中國現代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0年，1991年），頁602 - 603。

55 《顏國年君小傳》，頁81 - 82。

1943年始設工學部），多少有助於工業教育本土化，亦為殖民後期臺灣能迅速工業化的催化劑之一。⁵⁶由此亦可窺伺到顏氏兄弟對時勢洞察之尖銳與其關懷鄉土之深切。而顏欽賢則進一步以本身的力量來培育技術人員，於1940年相繼設立「礦工技術者養成所」和「瑞芳礦山機械工養成所」，⁵⁷（參見附圖3）承襲了其父叔重視本土人材培養的理念。

二、對子女教育的重視

顏家對教育的重視可以從他們的行動中看出端倪。在子女教育方面，由於20世紀初期殖民地的臺灣欠缺高等教育機構，所以雲年不僅將三位兒子送往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就讀，並讓女兒進入京都同志社大學。國年的10位子女亦分別在日本和臺灣接受大學教育：長男為日本慶應大學經濟系，次男、三男各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地質和農化系，四男就讀東京帝國大學法科，五、六男則皆受教於日本明治大學；長女畢業於現在的日本御茶水大學，次女和三女就讀東京的日本女子大學，四女在臺北的女子高等學院（後改名臺北女子專科學校）。而在他的安排下，子女的結婚對象亦都受過高等教育：長媳婦畢業於日本女子大學，二、三媳婦分別受教於御茶水女大學的理科和保育科，四男、六男未婚過世，五媳婦則是當時的基隆高等女子學校畢業；大女婿丁瑞鈇畢業於現今的一橋大學，二女婿魏火曜是東京帝國大學醫科畢業，三女婿劉青和為柏林大學化學博士，四女婿陳炳華是東京醫科大學畢業的醫生。受到重視教育的家風的影響，第三代內外孫（大部份成家）約40人中，30人在國外，博士碩士占半數。第四代內外孫54人，47人在國外，亦頗多得到學位者。⁵⁸

再者，最值得稱道的是，在重男輕女的傳統東亞社會中，顏國年卻對子女的育一視同仁，長女顏梅（1907 - 1993年）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她於1914 - 1918年就讀基隆公學校，1918年4月離鄉背井到東京，

56 陳慈玉，〈日治時期臺灣鹽業的發展－臺灣經濟現代化與技術移轉之個案研究〉，頁603。

57 臺陽股份有限公司六十週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編，《臺陽公司六十年誌》，頁51。

58 根據國年三媳施素筠教授提供的資料。

由於日語程度的關係，故降一級，進入小石川區礫川小學校的四年級，當年10月再轉學到本鄉區的元町小學校。1921年4月通過東京府立第一高等女學校的入學考試，但僅讀了兩年半（東京的高等學校為五年制，臺灣四年制），即因1923年9月關東大地震後東京的房子和學校皆成廢墟，而不得不離開日本返回臺灣，並且進入臺北第一高等女子學校繼續接受教育。1925年3月畢業後再度到東京留學，4月進入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現今的御茶水女子大學），1929年3月拿到文科（日文系）的畢業證書，4月回臺擔任臺北州立基隆高等女子學校的國文（日文）教師。1931年4月離開教職，與東京商科大學（現今的一橋大學）畢業的鹿港人丁瑞鈺結婚。婚後育有5名子女，全部留學美國。⁵⁹

相對於顏梅的自小留學日本，次女顏碧霞則在基隆高等女子學校讀了四年，畢業後才到日本女子大學文科深造。與魏火曜結婚後，除專心家務外，亦到臺大醫院社會服務部擔任義工，其子女五位皆曾到美國進修。⁶⁰同時，國年亦重視子媳的教育背景，例如施素筠係出鹿港名門，在臺北第三高等女子學校畢業後，即於1939年考上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成為顏梅的學妹，但她念的兒童保育科，後來回臺任教實踐家專服裝設計科。和其他顏家女子不同的是，她婚後回臺後才開始教授生涯，一直沒有離開工作崗位，而且在該校服務了33年才退休，並以所發明的「一刀裁剪」法獲得美國服裝紙版專利。但她亦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三子一都先後得到美國博碩士學位。⁶¹

由此可見顏氏對子女所安排的婚姻對象也是注重其教育程度。而當時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程度者，必定來自富裕階層，因此也與顏家事業版圖的擴大息息相關。

59 丁顏梅，《生涯の始末記》（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民國79年，1990年），頁121-156。

60 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9年，1991年），頁132-147。

61 鄭桂平，〈施素筠：那一雙手愛和布開玩笑〉，《中時晚報》（臺北），民國83年（1994年）8月7日大千世界版；施教授在1997年10月20日的口述。

伍、顏家的婚姻網絡

臺灣有一俗語：「龍交龍，鳳交鳳，穩龜交棟樑（駝背與呆子相交）」，意味著物以類聚，推而廣之，在聯姻的考慮方面，則是門當戶對的選擇方式。從日治時期顏家的婚姻事例中，可以看出此門當戶對的選擇範圍，並不限於「財富」，有及於「才負」的考量。並且就前者而言，往往從事業夥伴進一步發展成姻親關係。也就是說一個家族的婚姻往往與企業經營有極密切的關係，顏家自不例外，在其姻親之中，有些人即成為共同投資的事業夥伴，有的就進入顏家既有的事業，畢生貢獻經營長才。以下茲舉數例論述。

一、周碧

在顏家姻親中，與顏家關係最深切、最長久的是周碧，他自始至終都是顏家事業的夥伴，也是顏雲年之兄顏東年（1868～1920）的女婿。他生於1882年的臺北州新莊郡鷺洲庄，就讀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1904年畢業後隨即進入瑞芳公學校擔任訓導一職。在自臺北到瑞芳赴任途中，探訪基隆廳長山名金明，巧遇瑞芳庄學務委員顏雲年（當時30歲），兩人因此相識。⁶²

周碧頭腦清晰，擅長數字之計算，不但是瑞芳公學校的模範教師，並且教學之餘，成為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校外生，修習政治經濟學，意欲在教學義務年限期滿後，到華南去開拓新天地。然而景仰周碧的瑞芳庄父兄已覺察到他的心思，所以設法挽留他，而所想出的方法居然是「美人計」。就是：校長近藤郁郎和庄長呂九一起向顏雲年提出要求，請顏雲年把其兄東年的長女阿扁許配給周碧。雖然周碧當時月薪僅17圓，尚不足以養家，但雲年與他已有4年的交情，認為他深得當地庄民的信賴，前途無量，因此立即答應此婚事。於是依呂九和近藤的媒妁之言，周碧在1908年（周碧26歲）10月擇黃道吉日與顏扁完婚。⁶³

62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頁206；內藤素生編纂，《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1922年），頁71。

63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頁206 - 207。

婚後，周碧領悟到短期間內並不可能去海外發展，乃改變初衷，與友人共同企畫從事臺北醫學校和國語學校的學校用品販賣業，並向任職學校提出辭呈，待其許可。在此計畫進行中，突然接到雲年的急電，謂雲泉商會的共同出資者蘇源泉因病去世，迫切需要周碧協助經營雲泉商會。周碧一時之間猶豫不決，而雲年頻頻招喚，急如星火。此時當局許可他的辭職，周碧也終於下定決心在1909年8月進入雲泉商會。⁶⁴

1912年周碧與顏雲年、國年、谷信敬等人合夥創立臺灣興業信託株式會社（資金100萬圓），他成為該公司常務取締役（常務董事），從此開始和顏氏兄弟合作經營各種事業。當1918年顏基隆炭礦株式會社成立時，周碧為代表顏家股權的取締役（董事，當時董事有5人，其中3人代表三井財閥，另一位代表顏家的是翁山英）；他也是臺北炭礦株式會社的專任監查役（監察人），和常務董事雲年、董事國年一起代表顏家的股權。⁶⁵同年，雲泉商會改組為株式會社形態（資金20萬圓），周碧就職常務董事，襄助社長雲年，處理諸商品之販賣、委託交易等事宜。⁶⁶翌年，基隆炭礦收買木村礦業株式會社，周碧任監察人一職。⁶⁷到1920年，臺北炭礦擴充資金易名為臺陽礦業株式會社，收購雲泉商會所屬瑞芳金礦，成為採掘金、煤兩礦的一大企業，周碧被推舉為監察人。⁶⁸此外，周碧在顏家相關企業中的臺灣興業信託株式會社，和基隆商工信用組合中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923年1月13日雲年開始臥病，2月8日辭世，這段期間，國年和周碧一直輪流盡心照料，流露出珍貴的親情。⁶⁹雲年過世後，他繼續協助國年。國年於1937年4月30日病逝後，雲年長子欽賢（1901～1983年）繼任為臺陽公司、臺灣興業信託會社等的董事長，周碧依然扮演輔

64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頁207 - 208。

65 顏惠霖主修，唐羽撰著，《魯國基隆顏氏家乘》（臺北：基隆顏氏家乘纂修小組，民國86年，1997年），頁850；〈臺北炭礦株式會社實現〉，《臺灣日日新報》，第6480號，1918年7月7日，版5。

66 顏惠霖主修，唐羽撰著，《魯國基隆顏氏家乘》，頁812。

67 〈木村礦業總會〉，《臺灣日日新報》，第6780號，1919年5月3日，版6；〈事務刷新〉，《臺灣日日新報》，第6785號，1919年5月8日，版4；〈兩社之合併〉，《臺灣日日新報》，第6835號，1919年6月27日，版5。

68 臺陽股份有限公司六十週年慶典籌會委員會編輯組，《臺陽公司六十年誌》，頁26。

69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頁97 - 118，208 - 209。

佐的角色。當時顏家事業核心臺陽礦業會社的合資者三井財閥的日籍代表盛勢凌人，而周碧為監察人，開會時勇於直言，詞嚴義正，不屈不撓，日人亦敬畏之。戰後臺陽改組，他仍然襄助顏欽賢渡過最艱辛的日子，世傳顏家事業之恢復，周碧功居首。⁷⁰他在1948年所成立的臺陽礦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膺任董事。⁷¹

二、丁瑞鈇

丁瑞鈇生於1904年初的廈門，其曾祖父克家在鹿港經營船頭行，堂名「丁協源」，為當地有名的大行號，所屬帆船與對岸大陸港口直接貿易。曾祖父非常重視子弟的教育，祖父壽泉於1877年中進士，欽點知縣。父親寶光為彰化縣庠生，在1893年與鹿港蔡德芳進士的孫女秀瓊結婚，世人羨稱為才子佳人之合。翌年發生甲午戰爭，在馬關條約簽訂後，日軍抵臺，他們回到祖籍泉州陳埭，1903年夏季丁寶光過世於故鄉，年僅32歲，此時丁瑞鈇尚在母親腹內。瑞鈇出生後不久，丁氏家族在丁壽泉夫人的率領下，返抵鹿港，一宗族（共六房）努力重建舊居（俗稱舊協源），並收回一度被日本軍佔據的新第（俗稱新協源）。⁷²

由於出身書香世家，所以丁瑞鈇的母親很重視子女的教育（瑞鈇有三兄一姊），瑞鈇公學校畢業後，多讀兩年的高等科，才到臺南進入臺南商業專門學校。讀了五年（預科三年，本科兩年）畢業後，因成績優異而被學校推薦到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以下簡稱臺北高商）入學。三年之後的1928年，他進一步考上日本國立商科大學（現在的國立一橋大學），前往日本深造。⁷³

1930年春天，經由商科大學學長黃及時（其父黃純青議員，是顏國年的世交）的介紹，丁瑞鈇在東京和顏國年見面（事先，黃及時應國年之託，拿了幾張商大學生的照片給國年挑選）。丁瑞鈇乃拜託徵信所調查顏家情況，而顏國年亦向出身鹿港的友人辜顯榮詢問丁家情形，雙

70 顏惠霖主修，唐羽撰著，《魯國基隆顏氏家乘》，頁492。

71 顏惠霖主修，唐羽撰著，《魯國基隆顏氏家乘》，頁878。董事長顏欽賢。周碧卒於1980年，高壽99年。

72 丁瑞鈇，《懷恩感舊錄》（臺北：作者自印，民國75年，1986年），頁1-5。

73 丁瑞鈇，《懷恩感舊錄》，頁10-15。他是臺灣第一位由臺北高商畢業後邁向東京商大者。

方都得到滿意的答覆。於是丁瑞鈺跟著顏國年在7月初旬回基隆，見到當時任教基隆高等女子學校的國年長女梅（畢業於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現今的國立御茶水女子大學）。8月初旬，在臺北高商校長切田太郎的主持下，完成簡單的訂婚儀式。翌年3月底丁瑞鈺學成歸國，4月8日在臺灣神社完婚，媒人是辜顯榮（其長女嫁給瑞鈺二哥瑞彬）和切田太郎夫婦。⁷⁴

婚後，瑞鈺到基隆炭礦株式會社服務（雖然他已在畢業之前通過東京三菱商事株式會社的就職考試而拿到錄用通知書），先後擔任14年多的庶務用度主任、勞務課長、主任秘書等職，直到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接收基隆炭礦後，他才趁機離開該會社。⁷⁵在基隆炭礦會社時期，由於職務關係，他目睹到礦工待遇之低薄，和實際生活之可憐，乃努力爭取礦工待遇的改善與福利設施的提高，卻被前輩說：「假如要替勞務者向臺灣總督府強要主張的話，也許會引起思想上的誤解！」⁷⁶因此他認為在殖民統治之下，實在無法促進臺灣礦業政策之根本改革，覺得很遺憾。⁷⁷這也是他在戰後即離開基隆炭礦的一主因吧！

三、藍高川

藍高川是顏家的姻親，其女錦綿在1928年嫁給雲年次子德潤。藍高川生於1870年的高雄州屏東郡里港庄里港（今屏東里港），清朝時曾修習漢學。⁷⁸1895年5月日本登陸澳底，8月攻到臺南，藍高川組織防衛隊抵抗日軍，兵敗，退居臺南，兩年後局勢稍平，始返里港。⁷⁹1898年被任命為阿緱廳辦務署參事，1900年11月廢辦務署，他改任阿緱廳參事，由於對廳治（主要在農田水利事業方面）貢獻不少，所以1915

74 丁瑞鈺，《懷恩感舊錄》，頁19-26。

75 丁瑞鈺，《懷恩感舊錄》，頁39-41，79。

76 丁瑞鈺，《懷恩感舊錄》，頁39。

77 丁瑞鈺，《懷恩感舊錄》，頁39-40。

78 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年），頁51，謂生於明治5年（1872年）6月6日的阿緱廳港西上里阿里港街；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年），頁400，謂生於明治5年6月6日的高雄州屏東郡里港庄里港223號。而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藍敏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4年，1995年），頁7，謂1870年生於屏東郡里港庄里港223番地。

79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藍敏先生訪問記錄》，頁8。

年得到藍綬褒章，更被專賣局指定為阿里港鹽務支館和鴉片煙膏的承銷商。他在1921年6月進一步被臺灣當局任命為總督府評議會員，1923年4月獲得勳六等瑞寶章的榮譽。⁸⁰他並且屢被邀請參加皇家在東京新宿御苑所舉行的宴會、觀櫻會和觀菊會，是頗得殖民政府恩寵的臺灣人。

另一方面，他在1901～1907年間經營糖業和開墾事業，當告一段落後，他開始從事金融信託業。首先，於1910年，他和藍高全（堂弟）、林子瑾、蘇雲英、辜顯榮、張文選、桑原伊十郎、山下秀實、荒井泰治、賀田金三郎等29人共同創設株式會社臺灣商工銀行於阿緱廳阿緱街，資金100萬圓（成立時匯入25萬圓）。由山下秀實擔任頭取（董事長），藍高川則為董事之一（除山下秀實外，還有6位董事），持有200股。⁸¹其次，他在1912年和顏雲年等人一起組織臺灣興業信託株式會社，同時擔任監察人。⁸²

當時，藍高川和顏雲年、林熊徵、簡阿牛、辜顯榮、林獻堂、李延禧和黃欣等人是最初被任命為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的臺灣人。⁸³而雲年在1923年過世後，顏國年於1927年9月成為評議會員。⁸⁴因此可以說各在臺灣南部和北部擁有聲望和財富的藍、顏兩家不但門當戶對，而且是事業的夥伴，於是他們從事業夥伴進一步發展成姻親關係。

藍高川的長女錦綿生於1909年，在里港完成基礎教育後，北上就讀臺北第三高等女子學校（現在的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學校，以下簡稱第三高女）。畢業後遠渡東瀛，到京都女子專門學校進修一年。當在第三高女讀書時，經由該校校長小野正雄介紹，與國年和德潤見面⁸⁵

80 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頁51；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1937年版），頁400；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藍敏先生訪問記錄》，頁9-11。當時官鹽承銷總館負責人是辜顯榮，其下設各地支館，獨佔島內鹽之販賣，見臺灣總督府府報，第1750號，1905年5月1日，明治38年告示70號，〈官鹽賣捌所業務擔當人〉；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編，《臺灣鹽專賣志》（臺北：臺灣總督府專賣局，1925年），頁222-256。

81 杉浦和作，《臺灣商工人名錄》（臺北：臺灣商工人名錄發行所，1912年），頁68-69；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藍敏先生訪問記錄》，頁9-10。

82 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頁51。但不久即因改選而辭職。

83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藍敏先生訪問記錄》，頁10。評議會是總督府的諮詢機構，會長由總督擔任，副會長則由總務長官擔任，會員是由總督任命，共25名，包括官吏7名、在臺灣的日本人9名和臺灣人9名。

84 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52。

85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藍敏先生訪問記錄》，頁13-15。

（當時雲年已過世，國年不但要承繼其兄的事業，並且要為雲年的子女尋求適當的對象，而雲年長子欽賢已在1926年迎娶畢業於第三高女的士林人郭美錦）。⁸⁶德潤9歲時即負笈東瀛求學，當時在京都立命館大學法學科唸書，所以藍錦綿到日本後，兩人再度重逢。後來，顏家拜託林熊徵說項，於1928年4月與藍家正式聯姻，時有才人淑女之譽。⁸⁷

四、許丙

藍顏兩家聯姻時，顏家請許丙和張園遠從基隆到屏東迎娶藍錦綿。⁸⁸許丙生於1891年的淡水街，1907年進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就讀，1911年畢業後，旋即進入林本源總事務所，1916年被任命為林本源第一房總務股長，傾力輔佐林熊徵發展事業，1918年成為淡水信用組合理事，1919年兼任顏雲年所主持的臺灣興業信託株式會社監察人，⁸⁹而於翌年股東大會追認。⁹⁰1920年被推舉為臺北炭礦株式會社的董事。⁹¹如前所述，此年秋季臺北炭礦更名為臺陽礦業株式會社，成為顏家企業的一重鎮。

此外，到1933年為止，許丙的歷任各企業的要職如下：臺灣土地開拓株式會社董事、新高釀造株式會社監察人、振南貿易株式會社監察人（以上為1919年）、有恒產株式會社董事、株式會社宏文社董事、新高商事株式會社董事、高雄製糖株式會社董事（以上為1920年）、大永興業株式會社董事、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董事、永昌產業株式會

86 顏惠霖主修，唐羽撰著，《魯國基隆顏氏家乘》，頁354。又，郭美錦的父親郭邦彥生於1880年的臺北廳下士林街，少年時專修漢文；日本統治臺灣以後，他苦學日文。由於精通兩種語言，所以1896年被當局拔擢為士林辯務署通譯，歷任臺北地方法院通譯、臺北廳判任通譯。1906年離開公職，改行從事包種茶的輸出，與郭春秧共同投資錦祥洋行，任總經理。1916年辭職後，其弟邦光繼之。邦光在1935年擔任士林信用組合長，致力於當地金融的圓滑調配，並成為士林街協議會員和臺北州第三種所得稅調查委員，時稱擁有巨萬之富。以上參見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頁162，229；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頁90；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1937年版），頁111。

87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藍敏先生訪問記錄》，頁16，28；唐羽，《臺灣採金七百年》（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錦綿助學基金會，民國74年，1985年），頁325-328。

88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藍敏先生訪問記錄》，頁28。

89 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頁30；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年），頁40；內藤素生編纂，《南國之人士》，頁11-12；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1937年版），頁82；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年），頁118-119。

90 〈興業信託重役會〉，《臺灣日日新報》，第7153號，1920年5月10日，頁3。

91 顏惠霖主修，唐羽撰著，《魯國基隆顏氏家乘》，頁851。

社董事（以上為1921年）、日星商事株式會社副社長和株式會社華南銀行監察人（以上為1929年）。在公職方面，他於1920年被選為臺北市協議會員，1927年被任命為臺北州協議會員，並就任臺北商工會常務議員和臺北商業會理事，而在1930年7月終於被臺灣當局選任為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⁹²象徵著他代表當時的企業界人士的地位。其後，他拓展事業到中國大陸和朝鮮，他曾在1930年代經營朝鮮的礦山，並任「滿州國」宮內府顧問，1941年擔任臺灣經濟審議會委員，1945年被敕選為日本議會貴族院議員。⁹³

再者，他一直是臺灣興業信託株式會社的大股東（擁有200股），並擔任監察人，直到1939年他才轉任相談役（顧問）一職，而由女婿顏德修取代為該公司的監察人。⁹⁴

顏德修是顏雲年的三子，生於1907年，與德潤為同母藍氏所生（其長兄欽賢則是雲年嫡配柯氏所生），1914年隨父親東渡，居住在顏家位於東京的宅邸，並就讀附近的小、中學，1930年畢業於京都立命館大學法經學部經濟科後即返臺。1932年2月開始事業生涯，先擔任合名會社義和商行監察人，4月因國年的安排，而與許丙的長女碧霞結婚。⁹⁵

許碧霞在1914年出生於淡水，是日治時期罕見的臺北第一高等女子學校（當時日本人就讀的學校，現在的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的畢業生，後來曾擔任基隆市婦女會副會長。⁹⁶

在聯姻之前，許丙與顏家除了合作經營臺灣興業信託外，並曾經共同投資振南貿易株式會社，該公司創設於1919年7月，創始者是蔡蓮舫、張舜臣、辜顯榮、鄭拱臣、林獻堂、林熊徵等人，顏雲年只是股

92 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頁30；顏惠霖主修，唐羽撰著，《魯國基隆顏氏家乘》，頁951。

93 許雪姬主編，許伯埏著，《許丙、許伯埏回想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民國85年，1996年），頁184-185。他於1963年辭世。

94 顏惠霖主修，唐羽撰著，《魯國基隆顏氏家乘》，頁851；此外許丙並且和顏家共同投資振南貿易株式會社和臺北州自動車運輸株式會社，他都擔任監察人（監察人）。見顏惠霖主修，唐羽撰著，《魯國基隆顏氏家乘》，頁951，958。

95 顏惠霖主修，唐羽撰著，《魯國基隆顏氏家乘》，頁356，500。

96 顏惠霖主修，唐羽撰著，《魯國基隆顏氏家乘》，頁357，她於1984年過世。其五女嫁給林熊徵的兒子林明成。

東，而許丙則為監察人。該公司資金50萬圓，設立時繳入125,000圓，從事米穀、砂糖、雜貨、肥料、糖蔗、麻袋等商品之委託販賣；並受理南洋之砂糖、米穀和雜貨之委託販賣。不但在大稻埕新興街設置總公司，且於香港設有分公司，⁹⁷俾便經營臺灣與華南、東南亞之進出口貿易。

在兩家聯姻之後，顏欽賢於1938年8月，與三卷俊夫、竹內虎雄等人共同創設臺北州自動車運輸株式會社（汽車運輸公司），許丙亦投資該公司，並擔任監察人。該公司資金100萬圓，而成立時繳入50萬圓，設在臺北市泉町，所從事的業務有：（1）汽車物品運輸；（2）代理汽車附屬品之交易；（3）汽車修繕加工；（4）前項相關業務。社長是三卷俊夫，專務董事是竹內虎雄，欽賢則為董事。戰後依接收規定，該公司被當局列為日資，而併入臺灣省公路局。⁹⁸

五、謝汝銓

由於顏雲年和國年都擁有深厚的漢文素養，又愛好詩文，所以他們在當時的詩壇亦負盛名，也與詩友結成姻親關係。在臺灣興業信託株式會社中，從1915年開始擔任董事的謝汝銓（字雪漁），是雲年的另一種形式的姻親。謝汝銓的長子師熊在1914年娶雲年次女善（生於1897年）為妻。

謝汝銓乃清朝秀才，臺南人，1871年出生，長於詩文，日治初期就讀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後任職總督府學務課，移家艋舺。未幾，轉任警察官吏訓練所臺語講師，再應聘到《臺灣日日新報》社擔任漢文部編輯。1909年與同好共同組織詩社，取名瀛社，各地來會者150多人，推洪以南為社長，謝汝銓佐貳之。因為以詩會友，認識了雲年，進而聯姻，再進一步成為事業夥伴。他在1915年開始投資臺灣興業信託，並於1918年被選為雲泉商行監察人。雖然在臺灣興業信託中只擁有100股，卻一直擔任董事，直到1939年為止。⁹⁹

97 顏惠霖主修，唐羽撰著，《魯國基隆顏氏家乘》，頁951。

98 顏惠霖主修，唐羽撰著，《魯國基隆顏氏家乘》，頁958。

99 顏惠霖主修，唐羽撰著，《魯國基隆顏氏家乘》，頁805 - 810；唐羽，《臺陽公司八十年志》（臺北：臺陽股份有限公司，民國88年，1999年），頁461 - 462。

與其說他和顏氏兄弟是事業夥伴，毋寧可以說他們是「詩友」。在雲年過世後，謝汝銓以姻親總代表的身份所寫的弔文中，形容他們是「文字因緣，直結金蘭雅誼，蒹葭倚託，許分玉樹新榮，肝膽相照，心腹輸誠。」¹⁰⁰應是最好的寫照。並且謝汝銓一直在《臺灣日日新報》社從事新聞工作，後來成為《昭和新報》的主筆，¹⁰¹對於顏家事業的經營方面，或許關係不深。但他的人脈頗廣，或許在暗中幫助雲年、國年聯絡相關人士。例如1912年10月顏家寰鏡樓落成，於11月23日假該樓召開瀛社大會和六社聯吟會，適詩人許南英返臺省親，汝銓代邀任聯吟會主壇，與會者有50多人。會成之後，雲年詩名益揚全臺，這固然是雲年的才力和財力所致，但也是汝銓策劃之力。¹⁰²

1937年國年因病辭世，謝汝銓寫下〈哀輓國年姻親〉的長詩敘述國年一生的事跡：¹⁰³

仙人拋網鯨魚坑，元季毓鐘難弟兄，採炭淘金宏事業，
鴟夷三徙富成名。乃兄寰鏡築高樓，觴詠騷壇集五州，又得
陋園山水好，新居華萼會名流。

蓬島山川礦脈查，按圖索驥總無差，富源曾欲開三晉，
惜不成功負願奢。因宏眼界赴歐洲，萬里河山作壯遊，風俗
人情傳碧眼，陸離光怪卷中收。

基津社會作中堅，艷說顏家有兩年，評議員教參府政，
兄終弟及理當然。邯鄲一夢熟黃梁，壽夭窮通總幻場，有好
兒孫能繼起，功成身退亦何妨。一瓶豪飲沒蘭池，放浪形骸
醉不辭，老到雖云能戒慎，病深無奈藥難醫。甫見年華過五

100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頁171。

101 唐羽，《臺陽公司八十年志》，頁461 - 462；林進發，《臺灣人物評》（臺北：赤陽社，1929年），頁140。

102 〈謝雪漁賀雲年社兄喬遷〉，《臺灣日日新報》，第4432號，1912年10月2日，版6；〈寄賀雲年落成詩〉，《臺灣日日新報》，第4449號，1912年10月20日，版6；〈瀛社大會狀況〉，《臺灣日日新報》，第4484號，1912年11月26日，版6；〈祝顏君雲年新屋落成〉，《臺灣日日新報》，第4485號，1912年11月27日，版6；唐羽，《臺陽公司八十年志》，頁462。到1926年，謝汝銓擔任瀛社第二任社長，戰後他曾任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委員，1953年過世。

103 長濱實，《顏國年君小傳》，頁335 - 336。

旬，踟躕跨鶴出紅塵，應知紫府吟龍在，尚有溫情念故人。

六、魏清德

魏清德也是在文學界與顏氏兄弟相匹稱的。魏清德（1886～1964年，字潤庵）出生於竹塹，1903年自新竹公學校畢業後（第一屆），隨即考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三年後以優異成績畢業，回新竹中港公學校任教，不久通過日本在臺灣地區所舉行的第二次普通文官國家考試，稍後轉入《臺灣日日新報》社擔任記者，移居臺北艋舺。他擅長漢詩，其長才被《臺灣日日新報》主編尾崎秀真發現，而推薦他於1915年昇為《臺灣日日新報》社漢文部主任，¹⁰⁴前後任職約40年。

當瀛社成立時，他和謝汝銓都是創社會員，定期召開詩會，互相切磋詩藝，因此結識了愛好詩文的顏雲年、國年昆仲，而與臺灣第一任文人總督田健治郎亦為詩友。¹⁰⁵

當時魏清德為了撫養子女和弟弟，拼命寫稿，並替人改詩，以增加收入。全家生活非常樸實，¹⁰⁶時人都稱讚他因節約與努力，而累積了不少資產。但他對於自己感興趣的書畫，卻不吝於購買。¹⁰⁷是重視精神生活，比較忽略物質享受的文人。

魏清德原配生有二子一女，長子火曜（1908～1995年）原本就讀臺北老松公學校，後轉學到日本入就讀的南門小學校。自高等學校畢業後，他在1929年遠渡重洋到日本報考東京帝國大學醫科，但落榜了。翌年才如願以償，1934年3月取得醫學士的學位，並留在該校醫學部附屬醫院擔任小兒科的無酬助教（一直做到1939年）。4月迎娶顏國年次女碧霞（1912年生，日本女子大學畢業），介紹人是當時的《臺灣日

104 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記錄，《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9年，1990年），頁1；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頁36；新竹市政府編，《新竹市志》卷7，〈人物志〉（新竹：新竹市政府，民國86年，1997年），頁⑦146。

105 新竹市政府編，《新竹市志》卷7，〈人物志〉，頁⑦147；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記錄，《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頁1-2。後來他繼謝汝銓之後為瀛社第三任社長。

106 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記錄，《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頁2，6-7。

107 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頁36。

日新報》社主筆大澤貞吉。¹⁰⁸

由於顏國年和魏清德愛好詩文，私交很好，而閩人無數的國年也曾調查過魏火曜的學歷等，因此在雙方家長的安排下，魏火曜先回臺相親，再行文定之禮。顏國年當時極力提倡改善生活習俗，所以訂婚儀式一切從簡。和長女顏梅訂婚時相同，女方未收取聘金，聘禮的種類也盡量簡化。訂婚半年後魏火曜和顏碧霞才在臺灣結婚。¹⁰⁹

翌年（1935年）魏清德被推舉為臺北州協議會員，有機會參與州政。¹¹⁰他在國年過世時，寫下〈輓顏國年姻兄〉，描繪出國年的重要事跡、嗜好與他們之間的友情：¹¹¹

園陋居然擅美名，是真難弟與難兄，縱橫歐美遊觀遍，上下
金煤採煉精，
並效淵明先止酒，煩如諸葛竟捐生，薦蘿松柏交李切，拜奠
靈年涕泗傾。

七、李德和和張錦燦

李德和（1892～1972年）出生於雲林西螺，幼年時除了父親昭元教授漢學外，她也進入表姑劉氏所辦的活源書塾，並同時在西螺公學校就讀，稍長到臺北第三高等女子學校繼續學生生涯。完成學業後，返鄉在公學校執教四年。她勤於習藝，擅長詩文，曾加入西螺「莢社」。同時，她能繪畫、書法、音律、下棋、刺繡、養蘭、賞石等，當時號稱

108 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記錄，《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頁5 - 14，134 - 135。又，魏火曜曾任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小兒科主任、附設醫院院長、醫學院院長、中華血液基金會董事長等職，1968年因其在醫學教育工作上的卓越貢獻，而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七屆生物組院士。見〈魏火曜院士病逝〉，《中央研究院週報》，第517期，1995年2月17日，版1。

109 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記錄，《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頁134 - 135；丁瑞鈺，《懷恩感舊錄》，頁22。

110 新竹市政府編，《新竹市志》卷7，〈人物志〉，頁⑦146。

111 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336。陋園是顏家在基隆的府邸，原址為現在的中正公園。國年曾於1925年3月21日至10月27日到歐美16國旅行，參觀煤礦廠為主的各種工廠和博物館、美術館等，當時《臺灣日日新報》社的大澤貞吉亦同行。見同書，頁102 - 117，259 - 264。

「十絕」。¹¹²

後來，她嫁給嘉義醫生張錦燦，不久成為白玉簪諸人所創「羅山吟社」的一員。1923年，羅山吟社併入「嘉社」，她相當活躍出色，社中常擊鉢聯吟。¹¹³因為揚名於詩壇，所以認識了愛好吟詩的顏國年，進而結為親家。

另一方面，她幫助丈夫於1931年成立私立嘉義產婆講習所，培育助產士，兩年後更創立私立諸峰醫院附屬助產所。¹¹⁴嘉義詩人常在此雅集，名之曰琳瑯山閣，她乃自號琳瑯山閣主人。戰後，1951年她曾當選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¹¹⁵

她與張錦燦之間育有兩子七女，次女女英在1914年出生，畢業於日本女子大學文科後，1931年與顏國年長子滄海結婚，女英亦擅長繪畫，曾任日本女子社會教育會家庭科學研究所顧問。¹¹⁶

1937年顏國年過世時，張錦燦所寫的〈顏府國年親翁大人靈次〉，提及國年的事業及心志：¹¹⁷

德望遍瀛洲，偉業恢宏，欣薦蘿，得施喬松，正願高齡長厚蔭。

訃音傳武邑，愁眉莫展，帳陶朱，竟醒大夢，忝叨姻戚總傷心。

同時，李德和的〈顏府國年姻翁大人靈次〉則筆帶感情，更見其漢文的文學功力：¹¹⁸

去年此日會瀛洲，隔歲今朝赴玉樓，才媳陶朱推重鎮，
功超端木仰奇謀，陋園雨暗花無色，基港風淒月帶愁，未遂

112 龔顯宗，〈羅山女史李德和〉，《鄉城生活雜誌》總38期（臺南市：鄉城生活文教基金會，1997年3月），頁45；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293；江寶釵，〈走過的痕跡：嘉義地區文學的採集、調查、整理與研究概述〉，《漢學研究通訊》第74期（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0年5月），頁190。又，其父親曾任坎頭厝公學校分校主任、西螺信用組合理事主席。

113 龔顯宗，〈羅山女史李德和〉，頁45-46。

114 臺灣新民報社編，《台灣人名辭典》（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89年），頁226。又，張錦燦於1890年生在嘉義，1913年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後，先服務於臺南醫院，1914年回嘉義經營醫院。

115 龔顯宗，〈羅山女史李德和〉，頁47-49。

116 顏惠霖主修，唐羽撰著，《魯國基隆顏氏家乘》，頁361。

117 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215。

118 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215-216，又，瀛洲為國年之號。

杖鄉歸太急，豈醒蝶夢效莊周。

陸、結論

日治時期顏家是致力於臺灣經濟現代化最力的家族之一，從他們對礦業（金和煤）所做的努力中，可以觀察出他們和日本財閥、臺灣總督府之間錯綜複雜關係。身為政治關係良好的礦業鉅子，顏國年甚至曾經奔走於臺、中、日的官僚與企業界之間，¹¹⁹也曾折衝臺灣島內的統治者與民間人士之間，企求為受殖民統治下的臺灣人尋找較廣闊的生存空間與較大的權益。他的努力必定經由各種管道傳達到臺灣「當局」與日本政府，換言之，他憑藉東北亞區域產業網絡的建構，使自己在當時臺灣經濟與政治社會上居舉足輕重的地位。

進而言之，在日治時期顏家屢次捐款學術文化機構，包括瑞芳公學校、基隆公學校、基隆高等女學校和基隆中學校；¹²⁰雲年除組織詩會瀛社，參加臺灣總督府所舉辦的詩會外，一面提倡孔廟的重建，一面創設以促進臺灣人和日本人親善融和為主的「大正協會」。¹²¹處處顯示出他們重視文化與本土教育的苦心，也因此屢次受當局褒獎，更提昇了他們在官方和民間社會中的地位。尤其是他們不但熱心基隆神社的祭禮參拜，並且歸依三寶，護持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使殖民地當局認為有助於緩和民心、確保北部臺灣的治安，對「國家」之統治關係重大。¹²²但兩兄弟的喪禮卻都根據其遺囑，依照臺灣傳統的儀式，在靈泉寺誦經燒香後火葬。¹²³從此宗教面亦可窺伺出顏家置身於殖民地統治之下，受中日雙方文化薰陶與其包容的程度。

119 詳見陳慈玉，〈顏國年與中日臺煤礦業合作的構想，1924 - 1930年〉，《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2年，1993年），頁833 - 871。

120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頁71 - 79；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52。

121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頁66 - 70。

122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頁79 - 80；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43。

123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頁131 - 133；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131 - 134。

因此，顏家當時熱心教育事業、全力建設基隆博愛團、捐助日本紅十字會、以及興修輕便鐵路（基隆猴硐路、基隆金山路、瑞芳金瓜石路、鶯歌三峽路）和公路（基隆金瓜石路）¹²⁴等行為，固然可以說是中國傳統地方士紳的舉動，但或許也受到日本三菱財閥岩崎家將所珍藏的中國古典書籍公諸於世（設立東洋文庫和靜嘉堂）的啟發，而以投資臺灣、朝鮮與中國工礦業來累積資本的大倉財閥領導人物大倉喜八郎，¹²⁵於1900年正式創辦大倉商業學校（即現今東京經濟大學的前身）的故事，諒必影響顏家的致力教育事業。另方面，輕便鐵路和產業道路的修築不但方便於當地的交通，更有利於煤炭和金礦的運輸。至於對公益事業的投入則是發揮了悲天憫人的人性之一面。由於顏家對地方建設不遺餘力，又能配合「國」策發展產業，因此乃能成為臺灣總督府與民間社會之間的橋樑，甚至雲年和國年臨終前都得到日本天皇賜敘從六位。¹²⁶做為一個殖民統治下的家族，可謂達到了所努力的最高境界。

從參加喪禮的名單和弔電等的幾乎涵蓋了當時日本和臺灣的政治經濟界重要人物，¹²⁷可以窺知到顏家交遊之廣與其影響力。固然在殖民統治下的他們和臺灣當局的關係，不若日本財閥家族與其政府關係之密切；相形之下，所受到的「眷顧」也遠少於財閥，¹²⁸但經由臺灣總督府和財閥，顏家必然也能和日本政界人物相交往，提出他們對時局的看法。現在把此關係圖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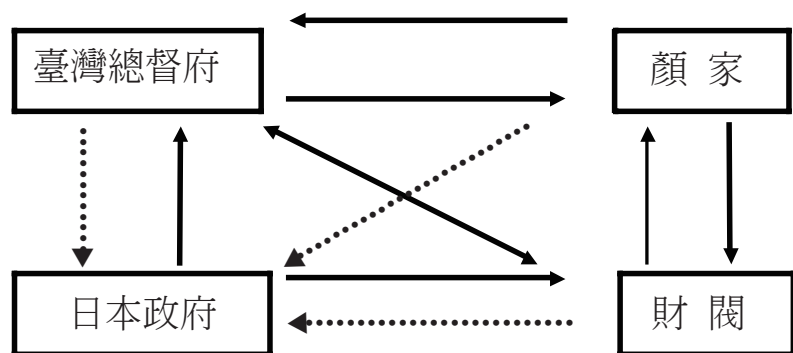
124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頁33 - 39。

125 大倉喜八郎於日本因牡丹社事件而進兵台灣時（1874年），負責為日本陸軍省調配軍需物資和募集人夫，因此展露頭角，利用與政治權力相結合的機會而累積資本，成為有名的「政商」。此後，大倉開展對朝鮮的貿易與投資，並在1895年日本占領台灣後，開始參與總督府的重大土木和建築工程。在中國東北，1910年直接投資100萬元（大洋銀）成立本溪湖煤礦有限公司，繼而投資山東與山西的煤礦業。詳見大倉財閥研究會編，《大倉財閥の研究》（東京：近藤出版社，1982年）。

126 《顏雲年翁小傳》，頁119，頁143，雲年為從六位勳五等；《顏國年君小傳》，頁54。

127 《顏雲年翁小傳》，頁125 - 194；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頁123 - 223。

128 詳見林明德、陳慈玉、許慶雄合著，《日本歷史與文化》（臺北：國立空中大學，民國81年，1992年），頁351 - 360。



換言之，顏家接受臺灣總督府和財閥的指示，而此指示大多來自日本政府；顏家亦有機會向總督府和財閥建言，此建言或許會傳達到日本政府，或許他們後來也直接與日本政界人士相交往而有向日本當局表示意見的管道。另一方面，臺灣總督府和日本財閥在對臺的政策和實際行動方面必定相輔相成。

總之，隨著時代的變遷，會出現不同模式的家族型態。因為家族為了求生存與發展，不得不多少遷就當時所處的大環境，日本殖民時代的臺灣顏家即因為順應時代潮流而能以礦業界為基軸，在臺灣政經界發揮力量。二戰結束後，雖然基隆炭礦株式會社因被政府判定為日產而接收；¹²⁹但顏家仍能以臺陽礦業公司為中心，向外延伸，到1978年時，其關係企業多達36家，¹³⁰在工商界扮演要角。這都是顏家眾人辛苦的結晶，而其基礎則奠定於日治時期的黃金、黑金（煤）兩礦業，隱含著時代環境所造就的多少「財富」和辛酸，但已無復昔日政壇上之風光地位。在往昔飛黃騰達時，由於顏家是「臺灣五大家族」中唯一以企業家身分出現於歷史舞臺者，故能注重基礎建設。從顏家人士的行為言論中，可以了解到他們與其說關心「國家」（日本）的前途與發展，毋寧可以說其關懷的重心是臺灣本土，是自己家園鄉土的基礎建設；他們力

129 臺陽股份有限公司六十週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編，《臺陽公司六十年誌》，頁53；接收合併入「臺灣工礦公司」前並未向顏家照會或洽商。

130 臺陽股份有限公司六十週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編，《臺陽公司六十年誌》，頁99。當時總資產額近10億元。

爭上游的潛在動機是為了與日本人相競爭，表現出臺灣人絕不亞於統治者的胸襟。而事實上也證明他們的成功使統治當局不得不刮目相看，進一步借重其對地方和產業界的影響力。他們也因此有機會在評議會中爭取臺灣人與日本人平等的待遇，企求打破民族歧視的藩籬，使被統治的臺灣人有機會在更自由、更平等、更寬廣的社會中發揮真才實力。

附表1：歷年臺灣九份、金瓜石黃金產量表（1898 - 1980）

單位：公分

年代	九份	金瓜石、武丹坑	合計
1898	9,184	41,329	50,513
1899	38,777	122,288	161,065
1900	40,500	346,579	387,079
1901	42,236	582,836	625,072
1902	85,762	861,293	947,055
1903	150,693	809,756	960,449
1904	539,126	1,209,771	1,748,897
1905	506,208	974,651	1,480,859
1906	363,053	997,180	1,360,233
1907	330,813	866,370	1,197,183
1908	280,061	1,329,592	1,609,653
1909	250,447	1,329,138	1,579,585
1910	347,846	1,242,134	1,589,980
1911	337,064	1,298,535	1,635,599
1912	355,419	1,209,576	1,564,995
1913	230,550	865,213	1,095,763
1914	352,446	1,574,828	1,927,274
1915	650,637	994,428	1,645,065
1916	693,773	745,023	1,438,796
1917	789,135	754,042	1,543,177
1918	273,493	514,481	787,974
1919	237,493	332,112	569,605
1920	199,295	354,871	554,166
1921	381,547	494,715	876,262
1922	252,437	423,116	675,553
1923	91,817	378,210	470,027
1924	59,429	206,396	265,825
1925	40,021	199,057	239,078
1926	68,620	228,060	296,680
1927	248,959	200,290	449,249
1928	129,912	143,132	273,044
1929	248,075	209,400	457,475
1930	248,361	233,681	482,042
1931	315,517	226,533	542,050
1932	578,660	208,845	787,505
1933	580,720	1,564,000	2,144,720
1934	1,012,197	1,757,000	2,769,197
1935	1,131,902	2,030,000	3,161,902
1936	1,240,937	2,485,000	3,725,937

1937	1,359,302	2,561,000	3,920,302
1938	1,700,313	2,604,000	4,304,313
1939	1,294,862	2,479,000	3,773,862
1940	872,383	2,262,000	3,134,383
1941	991,048	2,506,000	3,497,048
1942	795,018	1,905,000	2,700,018
1943	609,957	855,000	1,464,957
1944	181,330	547,000	728,330
1945	7,269	7,000	14,269
1946	13,187	—	13,187
1947	153,057	309,700	462,757
1948	350,653	285,200	635,853
1949	417,210	392,900	810,110
1950	268,577	550,100	818,677
1951	229,413	463,200	692,613
1952	282,164	474,100	756,264
1953	280,507	313,000	593,507
1954	259,775	294,700	554,475
1955	354,483	347,500	701,983
1956	567,465	355,000	922,465
1957	319,142	323,100	642,242
1958	236,331	278,300	514,631
1959	76,819	290,700	367,519
1960	56,247	406,800	463,047
1961	68,822	407,100	475,922
1962	106,921	551,100	658,021
1963	12,292	821,800	834,092
1964	55,691	440,000	495,691
1965	88,757	971,100	1,059,857
1966	192,759	1,222,700	1,415,459
1967	86,540	618,300	704,840
1968	53,891	533,000	586,891
1969	19,299	445,000	464,299
1970	9,709	594,000	603,709
1971	2,997	629,700	632,697
1972	—	314,700	314,700
1973	—	683,800	683,800
1974	—	759,700	759,700
1975	28	628,100	628,128
1976	7	786,500	786,507
1977	—	691,500	691,500
1978	—	464,600	464,600
1979	—	409,900	409,900
1980	—	390,400	390,400

- 資料來源：1、吉永勘一郎編，《瑞芳礦山概況》（臺北縣瑞芳：臺陽礦業株式會社瑞芳坑場，1933年），頁7 - 9。
- 2、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編，《臺灣之金》（臺北：臺灣銀行，民國39年，1950年），頁49 - 51；頁53 - 54。
- 3、臺灣礦業史編纂委員會編，《臺灣礦業史》（臺北：臺灣省礦業研究會、臺灣區煤礦業同業公會，民國58年，1969年），下冊，頁1091 - 92，〈臺陽礦業瑞芳金礦歷年金產量統計表〉；頁1100，〈臺灣金屬公司金瓜石「日礦」經營時期生產礦砂暨產品統計表〉；頁1101 - 02，〈臺灣金屬公司光復以來歷年產品統計表〉。
- 4、臺灣礦業史編纂委員會編，《臺灣礦業史（續一）》（臺北：臺灣省礦業研究會、臺灣區煤礦業同業公會，民國72年，1983年），頁432，〈臺陽公司瑞芳礦業所歷年金銀產量及員工人數統計表〉；頁446，〈臺金公司歷年金銀銅生產量統計表〉。
- 5、黃清連，《黑金與黃金》（臺北板橋：臺北縣立文化中心，民國84年，1995年），頁139 - 140，頁147 - 148。

註：表中資料不詳或停產者，以“-”符號表示。

附表2：臺灣煤炭產量表（1897 - 1980）

單位：公噸

指數：1916=100

年次	總產量	指數
1897	19,274	4
1898	42,262	8
1899	29,818	6
1900	41,944	8
1901	63,319	12
1902	96,585	19
1903	80,553	16
1904	82,020	16
1905	94,216	18
1906	102,384	20
1907	134,186	26
1908	153,099	30
1909	181,956	35
1910	229,802	44
1911	252,898	49
1912	276,246	53
1913	319,371	62
1914	342,787	66
1915	379,368	73
1916	517,581	100
1917	673,008	130
1918	801,520	155
1919	1,086,007	210
1920	1,139,358	220
1921	1,029,410	199
1922	1,347,449	260
1923	1,444,921	279
1924	1,506,451	291
1925	1,704,581	329
1926	1,794,511	347
1927	1,857,257	359
1928	1,583,598	306
1929	1,530,025	296
1930	1,598,728	309
1931	1,421,544	275
1932	1,354,995	262
1933	1,533,103	296
1934	1,520,926	294
1935	1,596,672	308
1936	1,734,777	335

1937	1,953,346	377
1938	2,198,542	425
1939	2,618,877	506
1940	2,814,414	544
1941	2,853,832	551
1942	2,356,313	455
1943	2,237,725	432
1944	1,913,937	370
1945	794,558	154
1946	1,049,071	203
1947	1,307,862	253
1948	1,650,049	319
1949	1,614,128	312
1950	1,404,630	271
1951	1,656,858	320
1952	2,286,394	442
1953	2,392,704	462
1954	2,117,603	409
1955	2,359,316	456
1956	2,916,046	563
1957	2,529,084	489
1958	3,181,418	615
1959	3,563,131	688
1960	3,961,946	765
1961	4,236,574	819
1962	4,553,581	880
1963	4,810,040	929
1964	5,027,653	971
1965	5,054,463	977
1966	5,014,533	969
1967	5,078,403	981
1968	5,014,928	969
1969	4,645,364	898
1970	4,473,467	864
1971	4,096,594	791
1972	3,913,218	756
1973	3,327,107	643
1974	2,934,427	567
1975	3,140,578	607
1976	3,235,810	625
1977	2,955,915	571
1978	2,883,904	557
1979	2,719,751	525
1980	2,573,530	497

- 資料來源：1、楊選堂，《臺灣之燃料資源》（臺北：臺灣銀行，民國40年，1951年），頁25 - 27。
- 2、臺灣礦業史編纂委員會，《臺灣礦業史（續一）》（臺北：中華民國礦業協進會、臺灣區煤礦業同業公會，民國72年，1983年），頁6，頁113。
- 3、黃清連，《黑金與黃金》（臺北板橋：臺北縣立文化中心，民國84年，1995年），頁86 - 87。

徵引書目

一、中文資料

(一) 檔案史料報刊

〈木村礦業讓渡〉，《臺灣日日新報》6755號，臺北，1919年4月8日。

〈木村礦業總會〉，《臺灣日日新報》6780號，臺北，1919年5月3日。

〈公共長屋落成〉，《臺灣日日新報》8045號，臺北，1922年10月19日。

〈兩社之合併〉，《臺灣日日新報》6835號，臺北，1919年6月27日。

〈事務刷新〉，《臺灣日日新報》6785號，臺北，1919年5月8日。

〈官鹽賣捌所業務擔當人〉，臺灣總督府府報，第1750號，1905年5月1日，明治38年告示70號。

〈炭礦合併〉，《臺灣日日新報》6869號，臺北，1919年7月31日。

〈炭界統一之謀〉，《臺灣日日新報》6625號，臺北，1918年11月29日。

〈祝顏君雲年新屋落成〉，《臺灣日日新報》4485號，臺北，1912年11月27日。

〈基隆博愛團許可〉，《臺灣日日新報》7038號，臺北，1920年1月16日。

〈基隆公共長屋〉，《臺灣日日新報》7663號，臺北，1921年10月2日。

〈基隆街公共長屋〉，《臺灣日日新報》8030號，臺北，1922年10月4日。

〈寄賀雲年落成詩〉，《臺灣日日新報》4449號，臺北，1912年10月20日。

〈博愛團工事〉，《臺灣日日新報》7982號，臺北，1922年8月17日。

〈臺北炭礦株式會社實現〉，《臺灣日日新報》6480號，臺北，1918

年7月7日。

〈興業信託重役會〉，《臺灣日日新報》7153號，臺北，1920年5月10日。

〈謝雪漁賀雲年社兄喬遷〉，《臺灣日日新報》4432號，1912年10月2日。

〈顏雲年氏之美舉〉，《臺灣日日新報》7439號，臺北，1921年2月20日。

〈瀛社大會狀況〉，《臺灣日日新報》4484號，臺北，1912年11月26日。

〈礦業會社解散〉，《臺灣日日新報》6840號，臺北，1919年7月2日。

林興仁主修，盛清沂總纂，《臺北縣志》，卷21，〈礦業志〉，板橋：臺北縣文獻委員會，民國49年，1960年。

（二）專書

丁瑞鈺，《懷恩感舊錄》，臺北：作者自印，民國75年，1986年。

司馬嘯青，《臺灣五大家族》，上冊，臺北：自立晚報，民國76年，1987年。

司馬嘯青，《櫻花、武士刀—日本政要與臺灣五大家族》，臺北：自立晚報，民國77年，1988年。

司馬嘯青，《臺灣五大家族》，上冊，臺北：自立晚報，民國76年，1987年。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

林明德、陳慈玉、許慶雄合著，《日本歷史與文化》，臺北：國立空中大學，民國81年，1992年。

唐羽，《臺灣採金七百年》，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錦綿助學基金會，民國74年，1985年。

唐羽，《臺陽公司八十年志》，臺北：臺陽股份有限公司，民國88年，1999年。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藍敏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4年，1995年。

許雪姬主編，許伯埏著，《許丙、許伯埏回想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5年，1996年。

黃清連，《黑金與黃金》，臺北板橋：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

新竹市政府編，《新竹市志》卷7，〈人物志〉，新竹：新竹市政府，民國86年，1997年。

楊選堂，《臺灣之燃料資源》，臺北：臺灣銀行，民國40年，1951年。

臺陽股份有限公司六十週年慶典籌備委員會編輯組編，《臺陽公司六十年誌》，臺北：臺陽股份有限公司，民國67年，1978年。

臺灣礦業會志修志委員會（編纂唐羽），《臺灣礦業會志》，臺北：中華民國礦業協進會，民國80年，1991年。

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編，《臺灣之金》，臺北：臺灣銀行，民國39年，1950年。

臺灣礦業史編纂委員會編，《臺灣礦業史》，下冊，臺北：臺灣省礦業研究會、臺灣區煤礦業同業公會，民國58年，1969年。

臺灣礦業史編纂委員會編，《臺灣礦業史（續一）》，臺北：臺灣省礦業研究會、臺灣區煤礦業同業公會，民國72年，1983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日據時代臺灣經濟史》，第二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47年，1958年。

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9年，1990年。

顏惠霖主修，唐羽撰著，《魯國基隆顏氏家乘》，臺北：基隆顏氏家乘纂修小組，民國86年，1997。

（三）期刊論文

〈魏火曜院士病逝〉，《中央研究院週報》，第517期，1995年2月17日，版1。

江寶釵，〈走過的痕跡：嘉義地區文學的採集、調查、整理與研究概

述》，《漢學研究通訊》第74期，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0年5月。

林朝榮，〈臺灣之金礦業〉，收入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編，《臺灣之金》，臺北：臺灣銀行，民國39年，1950年。

陳慈玉，〈日治時期臺灣鹽業的發展－臺灣經濟現代化與技術移轉之個案研究〉，《中國現代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0年，1991年。

陳慈玉，〈日本殖民時代的基隆顏家與臺灣礦業〉，收入《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

陳慈玉，〈顏國年與中日臺煤礦業合作的構想，1924 - 1930年〉，《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2年，1993年。

鄭桂平，〈施素筠：那一雙手愛和布開玩笑〉，《中時晚報》，臺北，民國83年（1994年）8月7日大千世界版。

龔顯宗，〈羅山女史李德和〉，《鄉城生活雜誌》總38期，臺南市：鄉城生活文教基金會，1997年3月。

二、日文資料

（一）檔案史料

《三井物產取締役會決議錄》，第375號，日本三井文庫所藏史料，編號物產2035，1925年4月10日。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資源調查委員會第一回委員會議事錄》，臺北：臺灣總督府，1937年1月，係屬秘件。

（二）專書

丁顏梅，《生涯の始末記》，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民國79年，1990年。

大倉財閥研究會編，《大倉財閥の研究》（東京：近藤出版社，1982年）。

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年。

友聲會編纂，《顏雲年翁小傳》，基隆：友聲會，1924年。

內藤素生編纂，《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1936年。

吉永勘一郎編，《瑞芳礦山概況》，臺北縣瑞芳：臺陽礦業株式會社瑞芳坑場，1933年。

杉浦和作，《臺灣商工人名錄》，臺北：臺灣商工人名錄發行所，1912年。

林進發，《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民眾公論社，1933年。

林進發，《臺灣人物評》，臺北：赤陽社，1929年。

長濱實，《顏國年君小傳》，基隆：尚友會，1939。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年。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編，《臺灣鹽專賣志》，臺北：臺灣總督府專賣局，1925年。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名辭典》，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89年。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年。

齋藤讓，《瑞芳及金瓜石礦山視察報文》，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1900年。

（三）期刊論文

島田利吉，〈金瓜石礦山の概況〉，《科學の臺灣》4：6，臺北，1936年12月。

附圖



圖1：顏氏家族及其姻親 1930年代・基隆陋園內家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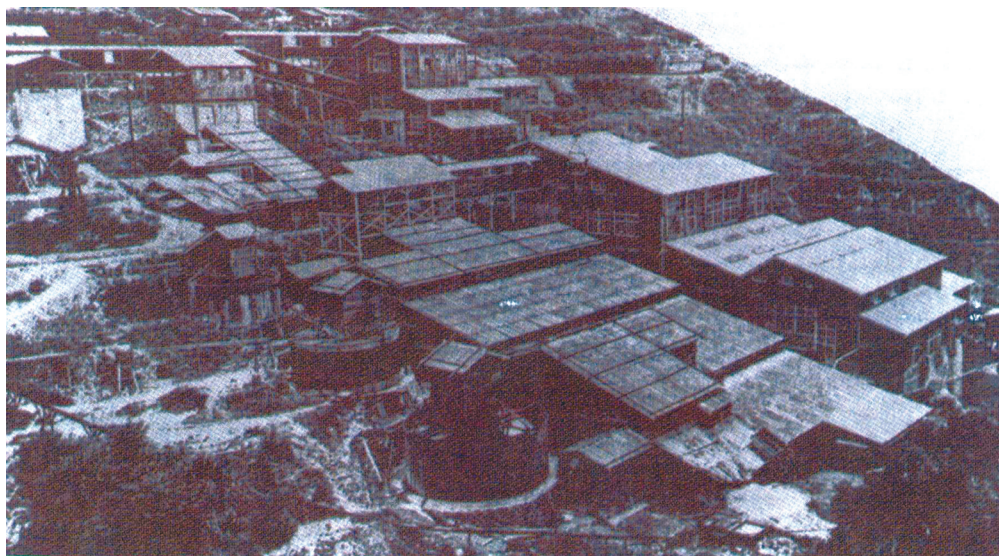


圖2：瑞芳礦業所選礦場全景

日治時期顏家的產業與婚姻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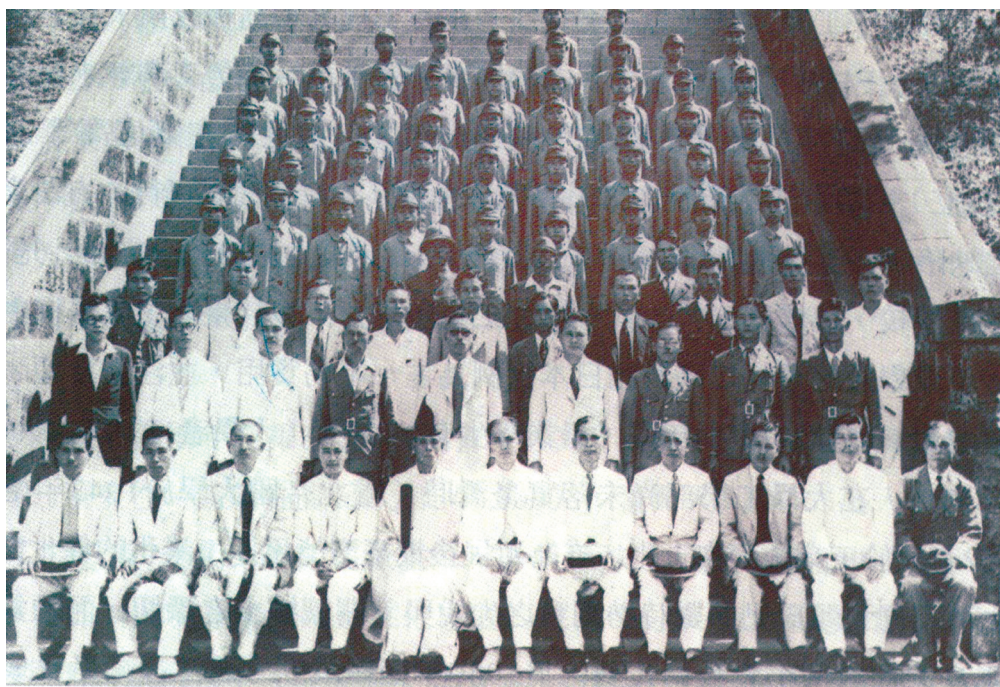


圖3：礦山機械工養成所第一期生和教職員，1940年7月2號 基隆神社前

The Enterprise and Matrimonial Network of the Yan Family in Jilong during Japanese Rule

Tsu-yu Chen*

Abstract

The Yan family became wealthy through the management of the gold mining industry in the Ruifang are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Yan's business expanded to coal in northern Taiwan. Initially they cooperated with one of the Japanese Zaibatsu, the Fujitagumi, to set up the Taipei Coal Mining Company. Fujitagumi subsequently withdrew its investment in this project, and the Taipei Coal Mining Company was recognized as the Taiyang Mining Company Ltd., which managed the gold mining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the Yan family was forc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famous Japanese Mitsui Zaibatsu to establish the Jilong Coal Mining Company, Ltd. Under the colonial government's policies to encourage the gold and coal mining industries, the Yan family developed new mining areas, introduced new techniques, and purchased new machines. With these developments the family enterprise reached its peak. Because the Yan family dominated the mining industry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public welfares projects, it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northern Taiwan, and became the bridge between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the populace. The Yan's enthusiastically took part in such committees as the Hyogikai (a special council of the Taiwan colonial government), the Temporary Commission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Industries in Taiwan, and the Commission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ropical Industries. The Yan family not only made great efforts to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for Taiwan's modernization (i.e., in educ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electric power), but also promoted equal treatment between the Japanese and Taiwanese people. It sought an end to

日治時期顏家的產業與婚姻網絡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racial discrimination, hoping that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might give up their oppressive colonial attitudes. Although the effect of the Yan family's suggestions may have been slight under these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they reflected the family's ideals.

The Yan enterprise was founded by Yan Yunnian, and expanded by his younger brother Guonian. These two Yan brothers were well educated in traditional literary Chinese. Aside from their success in business, the Yan brothers also earned themselves reputation as poet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Yan family had a tradition of strict family rules on the basis of patriarchy. Among the three Yan brothers, the eldest Dongnian was plagued by ill health. Therefore the second eldest Yunnian acted as the "man in charge" (zhangmenren), who made education and marriage arrangements for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e Yan family. When Yunnian died, Guonian succeeded to his position. With careful and meticulous calculation, Guonian followed the fundamental criterion of "marriage matches with those of equivalent social status," (mendang hudui) in choosing spouses for the second generation. The family's matrimonial circles covered the business and literary communities, and geographically reached as far as southern Taiwan. In addition, Guonian was particularly sharp at handpicking the right candidat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family business. In other words, marriage and business were inseparable. If we explore further into the marriage relations among members of the Yan family's matrimonial circles, we can conclude that this kind of "matrimonial network" based on ties of blood overshadow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etworks that were based on geographical proximity and business relations.

Keywords : Yan family, Japanese rule, Mining industry, Zaibatsu, Taiyang Mining Company Ltd., Jilong Coal Mining Company, Ltd., Matrimonial network.